

祝你・不要・撞車



李敖——

研究資料集刊6



許倬雲升天專號



《李敖研究资料集刊》总序

一阵旋风经过，只留下惊愕者在凌乱中摸索与重建。

李敖先生辞世后的这些年，对于他的读者、听众、学生乃至信徒而言，无疑是充满遗憾和惋惜的。李敖先生还有太多想做的事没有做，还有太多要写的书没有写，不管是对作者还是读者而言，这都是难以释怀的。我们固然不能替李敖续写这些伟大惊人的篇章，但我们也没有停下传递李敖精神的脚步，从李敖网站、李敖研究论坛到大李敖全集，一批批李敖研究者不断努力，从一个个文字、一张张图片、一则则新闻，到一段段评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专书，李敖研究者就这样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李敖精神，我们坚信，李敖的精神与思想将以这种形式永远存在下去。

自互联网兴起的几十年来，两岸的李敖研究者为我们留下来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形式上虽不同于专业学者著作，但在内容上却远胜许多所谓学者剪刀浆糊之作。然而随着网站的查封，人员的流散，很多资料丢失了。而由于消息的闭锁，许多与李敖相关的文章和报导也散落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不为李敖研究者所易见。有

鉴于此，我们决定发行《李敖研究资料集刊》，内容采集范围涵盖名家文章、读者作品、媒体报导，谨将其中有助于李敖研究的文章和资料拣选成辑，定期推出，既不捐前贤之功，又可广后来之闻。其中的一些资料，或许会在将来单独结集发行。同时，也希望读者可以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成绩，如有佳作，欢迎随时投稿。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通知。

最后，仅以此集刊献给九十岁的李敖先生。

辰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

月份牌



李教星火
群号: 578505007



李教星火 QQ 群

群内有海量李教相关资料，同时聚集着众多李教资深读者，能够为李教读者提供交流与学习的极佳场所，期待您的加入。

大李教全集 5.0

由 wjm_tcy 等众多李教研究者耗时十余年，集大量人力物力制成，汇聚李教书籍、影音三千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大李教全集 5.0 版本已于 2023 年正式上线，诚为李教研究提供极大便利。搜索 <https://books.leeao.net>，即可在线浏览。

AI 李教

AI 李教基于 deepseekr1671B 大模型，使用的知识库为《大李教全集 5.0》，可帮助读者回答大量李教相关问题。国内地址: ai.leeao.net 国外地址: 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_leeao

目录

编辑室提前报告	1
“刘自然事件”中的殷海光和李敖	5
向阳采访李敖	28
《李敖大全集》版本研究	41
《许倬云谈话录》提要	45
胡茵梦的美丽与哀愁	59
给李敖的信	70
重新理解 50-60 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与左翼”	78
二十七年前的往事	130
刘绍铭、萧孟能、许倬云信札三通	134
三十岁开启留学生活	141
成为“愤怒青年”李敖的靶心	148
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154
我眼中的李敖	164
地角星独角龙邹渊姚从吾	167

《现代学林点将录》提要	170
李敖投资拍片 第一部邀林青霞主演	172
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	173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提要	180



编辑室提前报告

辰之

《李敖研究资料集刊》系列已数月未更新，相信有读者已经默认此集刊“中道崩殂”、“半途而废”，其实不然。实际上，是我把这几个月的时间都用来制作新的书目了，即已发布在集刊网站上的《李敖相关书目版本图录》和目前仅在小范围内传播的《李敖相关书目编年提要》二书。

此二书是一套搭配使用的李敖研究工具书，其中共收有李敖相关书目一千二百三十余部，所收书目依照四分法分为“出版”、“评价”、“谈论”、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编辑”四部，皆以时间为序。其中“出版”部所收多为李敖自著，或编辑、出版的他人著作；“评价部”所收多为以李敖二字入书名和主要评论李敖的书目；“谈论”部则多为谈及李敖但占全书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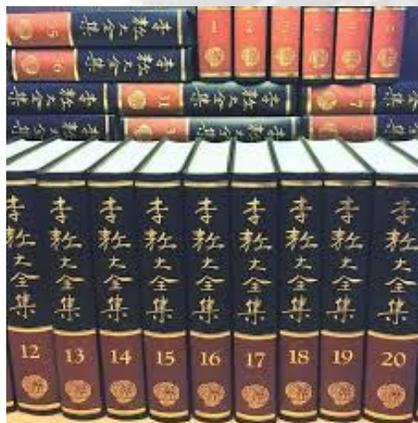
不大的书，以及李敖作序或李敖亲友所写之书；“编辑”部所收则为全选李敖文章成集或以李敖与他人文章向杂的文集，还包括各种音像制品及一些托名伪书。

《图录》以表格形式罗列书目名称、作者、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等信息，并配以该书相关版本的封面图，另有总表一份，杂糅四部，仅以时间排次。而《提要》则对各书作者生平里贯、全书宏旨、成书背景等详加介绍。二书相辅相成，有助于李敖研究者快速掌握李敖作品出版历史及他人对李敖的相关评价。

虽然只是两本书，但从采集信息、制成图表，到编排年次、撰写评介，都是靠一人之力来完成（当然也有许多朋友提供了各种帮助），故而一连忙了数月，才只能算大体完成，如果要真正以《李敖研究丛书》的形式面世，恐怕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图录》目前基本完成，之后还会有些小修改与补充，而《提要》的“谈论”一部中仍有约三百本书未加评价，但考虑到其他三部均已完工，所以还是先以简易的电子书形式流传了出来。

我之所以要制作这两部书，一方面是听李敖自述“奉李敖之名，

谈李敖之书也不少，几十年来，有 60 多种，浮游市面”，不免好奇是哪六十余种书，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三篇前辈文章的影响，即一剑穿过忧伤兄的《李敖大陆版著作总清算》、贾维斯兄的《李敖大大全集》和 fashion 站长的《大陆研究李敖综述》。这三篇文章



《李敖大大全集》

可谓李敖相关书籍的版本目录学奠基之作，但距今都已有二十余年时间，在之后这二十多年里，这一领域却基本呈现出一种空白状态，很少有人再去做这一方面的工作。故

而我在三篇文章写成的二十余年

后，也是在李敖去世多年之后，决

定对李敖的相关书籍做一次全面的盘点，这次盘点，或许可以使李敖相关书籍的研究更进一步，进而对整个李敖研究领域起到一些微薄的作用。

除了这两本工具书外，我还计划整理出《大李敖全集书名人名索引》《李敖之先生年谱》，此外还有考据萧案的《萧李案考》与

为贾维斯兄整理的《朱幾集》，奈何本人志大才疏，既不是哪吒也不是殷郊，生不出三头六臂，只能做个笨伯愚公，去一点点的完成这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了。

【特此声明：《图录》与《提要》虽未正式发行，但如欲提前获取此二书，可访问集刊网站 leeaoweb.com 查询下载，也可联系邮箱 2247674091@qq.com 或 Liaoagain@proton.me 领取。如您在阅读本社所出集刊及丛书时发现错误或有任何意见建议，也可致信上述邮箱。同时欢迎各位读者投稿，选中者将刊登在后续集刊之中，在此提前致谢】

“刘自然事件”中的殷海光和李敖

陈越

“刘自然事件”综述

李敖曾在书中提到《雷震日记》1957年5月29日的记录，“今日上午对捣毁美国使馆社论又重新讨论，殷海光说全文不可用，无重心，批评得体无完肤。我说我们要根据事实，客观公正。殷先生

认为我是书生，将来只有我一个人。殷并说宣传要讲技术，今日我才了解他这个人之为。我说你是实证逻辑学派，要根据事实立论，他



说研究学问可以，搞政治则

报纸刊登“刘自然事件”内容

不可以”，然后李敖说，“根据这段秘密日记，可以看到殷海光的另一面。人格可以这样分成两截，真太可怕了”。（李敖《足道与不足道》，《李敖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雷震提到的捣毁美国使馆一事即“刘自然事件”，又称“五二四事件”。刘自然被雷诺枪杀这一刑事案件的判决，引发台湾民众冲击美国大使馆这一群体性事件，时间虽有先后，但应视为同一事件。相关述史文字基本做到详略互见，这里仅依托二手史料的抄撮，将该事件整理介绍如下：

1957年3月20日，台湾国民党政府“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员刘自然，在阳明山公园附近的美军眷属宿舍被美军顾问团



的上士雷诺枪杀，雷诺具

凶手雷诺与死者刘自然

有外交豁免权，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应事官员促请美国大使馆公正、快速应对，之后同意驻台美军在台北组织军事法庭。经公开审理，雷诺于5月23日被宣告无罪，当天即与家人一同被遣送返美。

该案件的审理极不公正，如：雷诺的口供与现场勘验结果及关键证物有较大出入；陪审团人数严重不足却贸然开庭；法官越权干

涉庭审引导陪审团；控辩双方证人证词被区别对待；公诉人近乎不作为等等。（见吕迅《冷战逆行者：1957年台北刘自然事件始末》，《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3期）“联合报的记者在报导写道，在未宣判以前，有一位在顾问团工作的华人就向他透露，据在办公室中听到美军人员的谈话，最终的判决将会是‘无罪’，记者以此判断，雷诺案的结果，美军人员早已预知，‘法庭审判，不过欺骗中国人的花样而已’”。（翁凤飘《“刘自然事件”美国人杀人无罪？五二四事件引爆台北街头》，“重大历史悬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网站，2019年7月31日）“坊间普遍认为刘自然是因为美军物资黑市交易利益分配纠纷，被雷诺所杀。解密资料证实当时国民党掩饰刘自然陆军少校军官身分”。（张鲁台《台湾民众攻打美国大使馆事件》，奋起网站）

5月24日，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在报纸上发文，当天上午到美国大使馆前举牌抗议，现场接受中广公司记者录音采访并广播。民众对外国在台治外法权问题深恶痛疾，当天下午大批民众聚集在现场，听闻雷诺离台消息后群情激奋，冲入使馆捣毁汽车、美国国旗

与办公用品，“其中有人还拿出工具撬开使馆的保险柜，取出大批机密档案”。

（郑懿瀛《刘自然事件》，“文化部”网站）时任美国大使



的蓝钦后来在回 “杀人者无罪?! 我控诉, 我抗议!”

忆录里说：“……我们密码，并未殃及……没有任何重要的机密文件，有所损失”，并认为民众冲击大使馆不是为了获取档案柜里的资料和密码，（蓝钦著；徵信新闻报编译室译《蓝钦使华回忆录》，徵信新闻报 1964 年版，第 347 页；转引自朱韵珊《从刘自然事件到八二三炮战：1950 年代台美关系的奠定》，“国立政治大学”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政大机构典藏网站）但当时美方情报机构及一些政界人士却怀疑冲击美国大使馆事件是蒋经国的“救国团”指使。

大使馆内有数名美国外交人员遇袭受伤，随后在警方保护下撤离。“因为警力有效增援与反制，不能发泄不满情绪的部分群众转移目标到几百公尺外的美国新闻处与台北市警察局（两处相邻）继续抗议”，（前引张鲁台文）双方肢体冲突异常激烈，警方先后出动水枪及催泪瓦斯，人群多次散而复聚，

（见前引翁风飘文）直到警方开枪导致民众方面4人重伤1人死亡，对峙仍在继续。

蒋介石当日在台中南投的日月潭休假，闻讯后下令戒严。暴动持续近十个小时，才被卫戍部队驱逐压制。

蒋介石以未及时作出应对，放任事态发展为由，于5月26日将台北卫戍司令、宪兵司令、台湾省警务处处长三位高官免职，又于5月30日接见美军司令及



“朋友不杀人，杀人偿命，请不要学俄帝”

美军顾问团团长，以交流意见的方式加以解释和安抚，迫于美方压力，蒋经国被调任闲职，蒋介石一度在日记里说：“甚为经儿前途

及其今后工作忧虑不置。”（（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国史馆”2015年版，第十册第703-704页；第711页）但蒋经国只是短暂离开权力中心，同年十月下旬，国民党八大选举中央委员，蒋经国的得票数即已超过陈诚。

事件中“当局表面上轻判肇事者，但又另案罗织‘共同着手颠覆政府’罪嫌，将《民众日报》编辑林振霆以‘匪嫌’判处死刑，其后减为无期徒刑，坐监27年”，关押在绿岛监狱，1999年由“‘国家冤狱赔偿委员会’核给新台币580万元，在高雄燕巢‘冈山荣民之家’度过残年”。（习贤德《“刘自然事件”60周年省思》，《观察》杂志2017年4月总第44期；陈百龄《林振霆》，“国家人权记忆库”网站）“《联合报》记者戴独行被判5年徒刑，还有许多记者与编辑也遭波及”。（前引张鲁台文）国民党情治单位监视刘妻奥特华，断断续续到1969年还有她的动态呈报记录。（见《刘自然遗孀奥特华言行动态续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国防部”档案，1969年5月16日；转引自朱韵珊文）而蒋介石在6月29日的日记里说的是，“台北暴动案判决罪犯从轻处置，如

期发表，中外舆论翕服，皆无异词，则此一大案可告结束。”（吕芳上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册第719页）

关于“刘自然事件”中的美台关系、官方民间的反应及其心理，已有成熟的研究。（见冯琳《“刘自然事件”后的台与美——兼及“反美”之辩》，《台湾研究》2018年第1期）冯文



民众围攻美国大使馆

见解通达、剖析入微，前引朱韵珊文提示的参考文献宏伟富赡，也可资参详，这里不再涉及。

雷震与殷海光的分歧究讨

3月20日刘自然被枪杀后，“台湾各新闻媒体则一反过去对美国涉外事件息事宁人的戒慎态度，大篇幅地报导并评论本案始末”。（前引郑懿瀛文）5月24日暴动发生前，“台湾当局决策者面对舆论，至少没有采取管制压制的态度，而是默许了它的发展……除行政低效与权责设置不明等问题之外，也有有意宣泄民众情绪的意

味”，暴动发生后，美方虽然对外宣称对台政策不变，但美国政界和媒体仍有不少言论认为暴动是国民党政府策划的，因此国民党政府有意放开媒体舆论，“台湾各地民众通过阅报，了解到台北所发生的事件原委，纷纷表达对雷诺案的不满和对当局的声援，部分信件被‘外交部’转送蓝钦”，引起美国及亚洲多国媒体的响应，表达对民众的同情。（前引冯琳文）

据《李敖自传》所引《雷震日记》5月29日的记录，雷震打算发表与事件相关的社论，殷海光极力反对，虽然《雷震日记》无缘寓目，但6月1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了社论《雷诺斯的无罪判决与台北骚动事件的检讨》，政大数位典藏网站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发展海外史料资料库”藏有该文的日文版，据该藏品的中文简介，文章论述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中“对人命以及人权的轻视”，二是事件中“群众心理的激愤以及抗议事件的爆发经过”。无法确知这是否即雷震与殷海光讨论是否发表，进而发生争执的那篇社论。

同在6月1日，蒋介石发布文告，称“我深切了解二十四日一般群众为了对雷诺案件的判决，痛感不平，以致情绪激昂；但是不当让激昂的情绪，演变为非法的暴行”，美国“不仅是一个此时患难与共的盟邦，而且是和我们有深厚传统友谊的朋友”，今后要跟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任何友邦侨民和睦相处，互敬互爱。（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册第703-707页；《总统为台北不幸事件告全国同胞书》，“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号30-01-01-013-121）结合最终发表的《自由中国》社论的简介，蒋介石文告所反映的态度，以及当时社会上的气氛，可以推知雷震与殷海光的分歧所在。

国民党政府将反映民意的信件转交美国驻台大使蓝钦，是蒋介石发布文告一周之后的事情，所以美国态度发生转变是后来的事，雷震与殷海光讨论是否发表社论的时候，这事还没发生。雷震说要根据事实，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应该是希望站在台湾民众一边据实控诉，殷海光却说雷震过于书生气，又说宣传要讲技术，应该是希望疏导民情或者保持沉默。雷震说要根据事实，这点殷海光并没

有反对，说明两人都认为美方对雷诺案处理不公是事实，那么殷海光说宣传要讲技术，自然是认为不能过分依顺民意，如果因此导致美台关系破裂，届时自由理念又要到哪里去宣扬？

也就是说，殷海光的看法跟蒋介石发布文告的目的基本一致，就是希望台湾民众对驻台美军的对抗情绪尽快消泯，以免双方嫌隙加深，影响美国的对台政策。事实上美方也有这样的顾虑，“避免‘亲痛仇快’的想法对美政府在刘自然事件的解决上采取克制与谅解态度起到一定作用”。（前引冯琳文）而雷



卡尔·L·蓝钦
(1898-1991)

震秉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立场，才会说今天才了解殷海光的为人，而殷海光也才会将做学问和“搞政治”对举，并且暂时站在“搞政治”这一边。

主张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人不应该被谴责，这是人类理想与信念得以坚守的原初法则之一，但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一个人即便内心有是非，仍难免有迫不得已昧着良心不说真话的时候，这跟为一己私利故意说假话不同。从务实的立场出发，就事论事有可能会加剧冲突，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因此主张“引而不发”、“相忍为国”，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原谅的。殷海光在其时其地，把做学问和搞政治对举，并且站在“搞政治”一边，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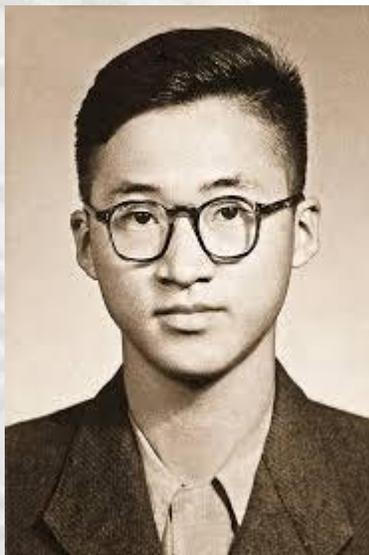
6月20日雷震写信给《自由中国》的编辑王纪五，提到打算写文章报道外国政界和媒体对“刘自然事件”的反应。（见“雷震致王纪五”，1957，《雷震、傅正》，“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52-01-11-05-005）8月份《自由中国》发表了王纪五的《美国通讯·七月五日雷诺事件在美国》，（见前引朱韵珊文的参考文献，原文未能寓目）也许就是雷震信中所指的文章。这些算是雷震与殷海光意见分歧的“后续”。胡适则在5月25日的日记里说：“昨天（廿四）台北发生了一件暴民捣毁美国大使馆的事。”后面附有两

则英文剪报，从编者的概括文字来看，都是客观公正的报道。（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八）》，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8-489 页）

“刘自然事件”发生前后的李敖

下面通过日记了解“刘自然事件”发生前后李敖的思想轨迹，（见李敖《大学札记》，《李敖大全集 17》，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 年版，页码不具列）当时李敖 22 岁，台大历史系本科在读。

5 月 16 日，暴动发生前一周左右，李敖说自己正在锻炼意志，“消极突击我一两小时，终于又被我消灭掉，万念俱灰的情绪毕竟是浮光掠影，它们在我心头的盘据愈来愈不能长久了。”



李敖
(1935-2018)

5 月 23 日，暴动发生前一天，李敖中午醒来后去找好友张世民，两人在饮品店聊了一个小时，“更坚定了我的‘立志不闻不问’的

态度”。（按：5月25日，暴动发生的第二天，李敖以亚当·斯密的话自勉，提到自己打算花时间替几位好友考虑他们的前途，5月28日，李敖说张世民不够坚强，“总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做一个得过且过的顺民”，自己想要帮助他。所以“立志不闻不问”这句话，应该不是指张世民的前途）

5月23日下午，去台师大看艺术系学生作画，谈及自己对艺术领域未曾深入了解，认为其中有大量自己会产生兴趣的东西。接着去了殷海光家，商谈后李敖做了几个大决定：要转哲学系，要学成德文，要多读一年本科，还有确定了未来的职业方向。（按：李敖大专联考时的第一志愿是台大中文系，以几分之差被台大法律系专修科录取，陈才生著《李敖评传》援引当年台大法律系主任梅仲协的说法，提到就应用学科而言，当时三年制的专修科反比四年制的法律系更优，但李敖入学后不到一年即自愿退学重考，如愿入读台大历史系，这时受殷海光影响，李敖又打算转哲学系，后来因故打消这一念头）

5月23日傍晚开始，与好友孟大中在台大宿舍畅谈，“我们曾仔细交换对同情心的意见，这可说是今天晚上的最大收获，使我对同情心的内涵增加了不少的了解和经验”，还提到校园内的夜色幽静而美好，两人一起吃了面和西瓜，将近12点孟才离开。（按：虽然刘自然被雷诺枪杀的舆论早已发酵，但后来美台双方都认为冲击美国大使馆并非有组织有预谋的，所以暴动发生前一晚，李敖和孟大中状态松弛是很正常的）

5月24日，暴动发生当天，李敖肯定好友翁松燃的选择，说他洁身自爱，不甘随波逐流，具体所指何事未详。（按：李敖与当时的女友罗君若因为罗的家人反对而分手，李敖吞服安眠药



翁松燃

自杀，就是由同宿舍的翁松燃及时发现，送院急救的。6月5日，

李敖说：“过去受了‘多元宇宙论’的影响，我一直把爱情在人生中的比例看得太高了，所幸我今天极能看穿此理，补牢尚未嫌迟。”

5月26日，暴动发生后两天，李敖提到朋友王建人取笑他靠写日记来维持内心的自律，李敖承认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耽溺”，决定每天只用较少的时间来读修养类书籍和写日记。（按：这些锻炼心志的记录从这一年的2月已开始，一直到8月仍频繁出现，可以说是李敖1957年日记的主要内容）

殷海光对李敖的影响再议

暴动发生前一天，李敖与殷海光这两位继胡适之后，二十世纪台湾地区思想传播领域最重要的人物第一次正式见面，殷海光当时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自由中国》主笔，几个月前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了谈胡适的文章，殷海光注意到李敖，主动托学生张灏约见。

李敖初次见面就受殷海光的影响，做出几个关于当前学业和未来职业的重大决定，李敖在日记中的用辞是，“与他商谈的结果促进我几个大决定，诸如转哲学系，学成德文，多念一年，与夫我将

来职业之选择，我都有了很迅速的決定”。根据措辞，李敖似乎见面之前已有想法，这次谈话只是使原本已有雏形的想法得以迅速锚定。陈才生说“一席谈话便生转系之念，可见这次约见对李敖思想产生的震荡是多么巨大”，（陈才生《李敖评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其词也许过甚了。李敖后来将殷海光当初对自己的影响缩小，说初次见面两人话不投机，说自己当时对殷海光印象非常差，李敖也过甚其词了。这点陈才生在《李敖评传》中，马家辉在《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中都曾指出。

6月12日，也即暴动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李敖在日记里说：“既决定转哲学系，复有尽承海光衣钵之意，盖我深信他走这条路对世道人心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我深信在这方面的贡献是‘舍我其谁’的，我非常希望以我之才，能对世道人心有许多伟大的贡献。”这也不宜认为李敖是受殷



殷海光
(1919-1969)

海光的巨大影响而立下决心，而是李敖抱持着对殷海光的尊敬，同时表达对自我的认识与期许，换句话说，这是“我希望追随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事，我相信我也终会成为伟大的人”，而不能理解为“是殷师的指引，使我有这样的想法”。其间的差别有必要加以区分，因为李敖的情况比较特殊。

李敖性格顽强、固执，文章锋利、有趣，人生频历苦难，内心饱含冤痛，对世情有超乎常人的悲悯和感愤，臧否人物常常攻其一点、失于一偏。像李敖这样的作家型思想家，跟学者型兼作家型思想家（如鲁迅），学者型思想家兼思想史家（如胡适），学者型思想史家（如余英时），作家型思想史家（如何炳棣），其夺目辉光皆各不同。李敖的观点往往穿透力强却有失平允，其所长在于论世，所短在于知人，在天下人对特立独行的先驱赢粮景从的时代，于思想传播领域创下不世之功，却常被精英腹诽，在天下人百犬吠声恨不能生啖精英的时代，则常被庸众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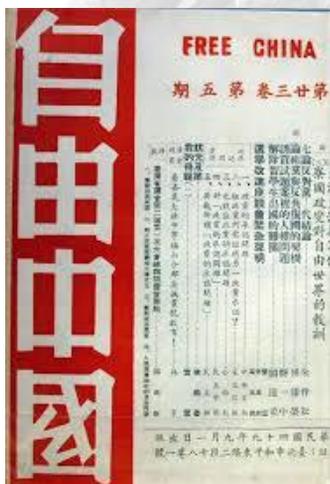
学界重师承，上一辈的研究旨趣或研究路径对下一辈有较深的影响，但李敖一贯处事主动，极有主见，反抗精神和对抗意识都很

强，情况有所不同。殷海光对李敖确曾有过影响，但不是殷海光通过论文写作予以指导，而是李敖通过阅读殷海光的著作得到启发，虽有师生之实，李敖却更像殷海光的私淑弟子，虽不及门之亲，李敖却更像殷海光的衣钵传人。与其说李敖是“趋向”殷海光，毋宁说他是“遇见”殷海光，以李敖的才情和志趣，他“注定”是要走这条路的，只是按照历史的出场顺序，他在殷海光后面，所以他这条小河理所当然会与殷海光这条大江汇流，直到接替殷海光成为大江，四处奔流、冲决罗网。

李敖对“刘自然事件”的看法

虽然最终主流看法认为这场暴动的发生是偶然的，但社会情绪的酝酿确实已有一段时间，暴动发生当天及第二天，李敖不可能毫不知情，只能说李敖没有在日记里提及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不代表李敖没有思考或没有在与师友的交谈中表达。李敖思考和表达了什么，无法确证，但李敖不会“怎样”想，不会“怎样”说，却可以推导出来。

前文提到的李敖发表在《自由中国》的文章，叫《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后改标题为《关于〈胡适文存〉》，收在《胡适研究》一书里。李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只发过这一篇文章，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在讨论《胡适文存》是否应该大量删节与思想相关的内容，以及国民政府当年如何限制言论。如果李敖当时对社会时



政缺乏关注，就不会有殷海光主动约见这回事了。“刘自然事件”是当时社会上最主要的政治矛盾，也是李敖和殷海光最敏感最专注的思想领域的议题，而且当时没有不便交谈的外部阻碍，殷海光被国民党政政府软禁是1960年雷震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自由中国》

李敖1981年在狱中所写的长文《我的殷海光》，（见《李敖全集》，大李敖全集5.0网站）将他与殷海光之间的交集做了详尽的回溯，但或有意或无意地漏掉了《大学札记》里关于殷海光的记录。7月19日，也即暴动发生后将近两个月，

李敖又去了殷海光家，这次是跟好友马宏祥一起去的，“先生赠我《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一文之油印本，此文甚好，《祖国》曾转载之。”查得该文1957年5月发在史语所集刊上，李敖提到《祖国》曾转载，说明李敖当时对殷海光的著作很关注，自然也对殷海光的思想很关注。

这两次会面一次在暴动发生前一天，一次在暴动发生后将近两个月，虽然没有材料明确提到两人就“刘自然事件”有过交流，但如果说当时李敖就已经和雷震持相同看法，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殷海光则认为应该“引而不发”，而李敖和殷海光毫无交流，避开了重大意见分歧，李敖因得以继续激赏殷海光的文章，服膺殷海光的战斗精神，以至于打算转到殷海光所在的哲学系从其学，这实在太缺乏合理性了。

由此可以说，暴动发生前后的那两次会面，李敖和殷海光不太可能没有就“刘自然事件”交换意见，也不太可能在“刘自然事件”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

其实暴动发生四年后，李敖有对类似的问题表达看法，虽然说的是胡适在雷震案中的立场，但跟殷海光在“刘自然事件”中的立场是同一类问题。1961年李敖对殷海光说，雷震组反对党必然导致《自由中国》被查封，“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李敖《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73-194页）再往后，李敖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反省，2011年5月30日李敖发了一条微博，标题叫《老去一得》，其中说道：“年轻时，我责人甚严；年老了，我会设身处地，一件难事，如果我做不到，我不再责备他做不到；如果我不能比他做得更多，我不再责备他做得太少。当年我责备胡适不反对蒋介石，今天我知道他技巧的反对了，设身处地，我也不能比他做得更多了。”（李敖《虽千万人，吾往矣》，大李敖全集5.0网站）因此可以说，“刘自然事件”发生时，李敖应该与殷海光意见相同，都认为应该“引而不发”。

余论

李敖2011年发布微博，站在务实立场谈雷震案，2015年出版《李敖自传》，却又站在道德立场谈“刘自然事件”，表达了截然

相反的看法，此距“刘自然事件”的发生已逾半个多世纪。可见李敖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时有反复，在道德立场与务实立场之间跳跃不定。其实殷海光也一样。《雷震日记》中出现的“将来只有我一个人”这句话略显突兀，大概是殷海光个性使然爱说狠话，说雷震对“刘自然事件”的态度很书生气，说这样下去以后杂志社同仁们跟雷震意见相左，只剩雷震一个人，雷震才会气到说“今日我才了解他这个人之为人”。但几年后雷震案发生，殷海光同样很书生气地站在道德立场谴责胡适，无形中做了“刘自然事件”中的雷震，这点常被指摘。

无论是雷震案中的胡适，还是“刘自然事件”中的殷海光，其选择都是基于无奈，而不是暧昧。李敖多年以后对曾经激赏、服膺的老师殷海光，有极尖锐的批评，事关人格，即便只是一段短评也有必要分说清楚，因而梳理材料，简述史事，检讨李敖受殷海光影响的深浅，发见殷海光及李敖当时的想



雷震在胡适墓前

法，以证明殷海光作为启蒙思想之尊宿，战斗精神的风帆，并没有违背原则，其心理痕迹眉目清晰，须加申说，用示将来。



向阳采访李敖

海心 整理

T01-视频

向 阳：就是世界上写白话文写的最好的前三名，你知道是谁吗？

“肯定有个胡适”

“没有”

“李敖，李敖，李敖”

我是去过李敖的书房，而且去了两回，有视频为证据。

李 敖：来，欢迎欢迎。

向 阳：老先生，你好，我是向阳。

李 敖：欢迎，欢迎

马家辉：李大哥！

李 敖：那年轻，我就小朋友。



向阳

马家辉：李大哥，李大哥，我那个太感慨，我第一次来拜访你的时候是19岁，当时我来按门铃，按了好久，你才来开门，没穿衣服，

披着一条毛巾，然后我就说你跟...嘿嘿嘿，反反正你披条毛巾就对了。

李 敖：这个房子啊，历近沧桑，后来 921 地震以后呢，觉得不太安全，又有人写信恐吓我，说要杀我，所以我就搬走了，就把那个房子租给一个日本人，要杀的话就杀掉一个日本人。

向 阳：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有点感冒，但是身体还好，而且声音很响亮。

李 敖：这才是我的毛笔字，现在都写不了这么好了，现在手没那么稳，我的稿子并不好看，因为有的是躺在床上写的，倒着写的，这稿子零零星星也写了这么多。

向 阳：李敖的书房有那么几个特点，一是文稿多。

李 敖：我的每一个红的夹子都代表我的一本书，所以我常常做工呢，做什么时候呢，在这桌上做工，回去倒一杯水喝，回来以后就到其他桌子上去，做起第二本书来了，不是懒惰，因为我同样时间做别的事情，只是我没有集中在做这一本，你看我只要集中在做一

本，这是我一本，集中做一本的时候，在做这种，这都是很多都属于一些英文被我改写过的。

马家辉：那你同时做这么多事情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不耐烦只做一个事情？

李 敖：单独做我会累，可是我换个题目以后我会稍稍疏解一点点。

李 敖：所以为什么说灵感，那时候你写文章靠灵感，我说妓女接客要靠性欲吗？靠灵感的文章只能写一篇，没有灵感不能写的，那怎么行。

向 阳：李敖做学问的功夫是我挺钦佩的，就是收集资料，他的文章他一再说了。

李 敖：你们好像公安来检查

向 阳：抄家了。

李 敖：我的见解可能见仁见智，或者胡说八道，见解，可是资料真的一页代表一个细节，为什么这么多，因为一览无余，你边上全都是资料，你找不到它，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放电脑里面，对不起，



向阳在李教书房

我不用电脑，原因我也不会，我觉得电脑不是平面的被我摸到的，一下跳到不见了，一会出来。

李 敖：大部分可以找到，如果一时找不到，三分钟，注意啊，反正我就不找你，我要继续找下去，我会耽误我其他的工作，宁肯啊，等什么时候，有一天它会浮出来，这资料大部分都是浮出来的，大概那就是，我可以找到它。

马家辉：你坚持不找助理的理由是什么？

李 敖：是他跟不上我，他节拍跟不上我，我是个暴君，我在搞节目搞资料的时候，很严格的，他跟不上我，都变成一个独夫。

向 阳：李敖的传奇中肯定有那么几点让人很钦佩，一个是以写作立于世间，行走江湖，一个是趣大美女，他的几任太太都是大美女，一个是他公开的跟官方叫板。

李 敖：我为什么有一个美帝的照片，肯尼迪。

向 阳：哦，肯尼迪。

李 敖：肯尼迪。

李 教：为什么有他照片，提醒你自己，荣华富贵，一枪干掉，什么都没有了。

向 阳：古人藏春宫画是为了防火的，李教用美女的是提高自己的亢奋值的。

李 教：这对女孩子，我坐牢的时候这张



《playboy》的画面带

李教书房一角

进去了，后来美国人的审美标准就改变了，都是大奶大屁股，不好看。这对双胞胎比较秀气，为了比较有效果，我就把它放在这里，镜子里面，镜子里面的画面比它好看，为什么，人变瘦了，小一点，告诉我们，雾里看花，镜中看美人，水中看月，经过过滤，这表示经过过滤，镜子里面的比较好看。

李 教：这个桌子有 200 年。

向 阳：还有一多是古董多，李敖自己跟我们坦率的说过，他挣钱真的不是靠写作，但是他的谋生是用他的收藏来卖钱的。

李 敖：请你们看看这个桌子角，这个圆角，不是一块木头钻出来的，三块木头拼组。

向 阳：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李 敖：也不多了，5万人民币。

李 敖：你们在台湾看了我以后不要看别人，土的不要看。

向 阳：那一年第二次去李敖书房，是为了请李敖给我们做一个节目，《小强填字》，我们把它改成一个真人秀，想请李敖他来做评委，做指导老师，他也一口应诺了，而且做了很多的功课。

向 阳：到时我很快打电话来了。

李 敖：你直接偷偷付给我也可以，不要找他（马家辉）。

向 阳：再见。

马家辉：再见。

李 敖：拜拜。

向 阳：后来他没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是他的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成为我的一个终身的遗憾，因为那时也是李敖先生重回大陆的一个契机，但是这个契机永远的消失了。

T02-视频

灵感

李 敖：我在这屋里有五个台子，我可能在这做工，说不定倒杯水回来题目就换了，到那个桌子去了，所以为什么说灵感，你写文章靠灵感吗？我说妓女接客还靠性欲吗？靠灵感的文章只能写一篇，没有灵感不能写了，那不行。

对联

李 敖：陈寅恪提出来，他说北京大学考中文的，入学考试考对联，对联就看出你对对仗，对中文的结构（的理解），胡适他们反对，事实上这是很好的一个切入方法，因为它可以看出来，看出来你中文的结构来，它可能很是落伍的东西，可是只有中文有这个特色，看出你的对联，对联好的是很少了，不过有的还是有的，有的不一定对联，三个字也可以对，胡适之一般对孙行者，不是吗？对的好

得不得了，胡对孙，适之对行者，后面第三个字是抽象字眼，虚字“之”字，它这边“者”字“，抽象对抽象，对的好的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测验你的中文，它的缺点，像胡适提倡文学革命，说这讲对仗，可能文字变死了，那看本领了，你要写成六朝的文章，骈体文，那就无趣了，可有的偶尔小对仗，还是可以看出中文的特色，中国人认为我们如何做中文，如何写好中文，如何保护中文，如何靠中文赚钱，这都是我们要做的。

T03-视频

李 敖：那个豪宅，怎么证明是豪宅，说我跟小 S 的一句话就是豪宅，我说小 S 你们住的帝宝，没有我家那“豪宅”，帝宝是暴发户住的，所以她嫁给暴发户了，小 S 出了问题，我们那个是真正有钱人住的豪宅，（现在所在的）这是我的书房，这是我起家的地方，不算，这不算（豪宅），那为什么要这么嚣张显摆有钱呢，就是告诉你，我很贵，没有便宜的，可是货是真的好货，因为我有很多很好的观念，并能够执行，

T04-视频

李 敖：带你们看一看我的神秘卧室，你们都没看过，卧室里没有窗，请进。这是我的厨房，就像波兰人一样，波兰人的一些活动都在厨房里过，这是2000年奥运的那个海报，你看这个英文，我很喜欢英文，“it's difficult to soar with the eagles”，跟老鹰一起飞翔是很难的，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when you work with turkeys”，当你跟火鸡扯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能跟老鹰一起飞了，可是“turkeys”，英文还有“王八蛋”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跟王八蛋扯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够（到达）高的水平了。

李 敖：我的每一个红的夹子都代表我的一本书，工作中还没有完工，等于赛跑一样，跑马一样，一声令下，多少匹马在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工作方式都是这种方式，单独做我会累，可是我换个题目以后



李敖书房部分资料

我会稍微疏解一点，这是我偷懒的方法。

李 敖：在我看起来，同样一个观念用一种强烈的表达方法，简练的，准确的，甚至粗野的一个方法，你怎么写也写不过我。

李 敖：一个小男生和一个小女生互相 KISS，接吻比赛，男的吻小女生，吻的毛手毛脚，很笨，这个小女生把他推开，我来吻你，英文就是 letmeshowyou，中文翻译就是我做给你看，letmeshowyou，这个翻译成中文，你翻译出来，letmeshowyou，说我做给你看，是好的中文吗？绝对不是的，那什么是好的中文，有一句话是好中文的，就是：看我的。王安石的诗，春风又绿江南岸，他们看过王安石的原稿，原稿不是绿字，春风又吹江南岸，吹字不好，春风又到江南岸，到字不好，春风又抵江南岸，抵字不好，最后选了绿字，太好了，这个字，那么抽象，可是那么好，文字也是一种声音，无声胜有声，也是一种声音，大家把它造出来，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它好，不好在哪里，我讲给你听。

李 敖：我们在抢救中文，电脑帮着我们复活，可是它也会把我们吃掉，就像英文把法文吃掉一样，美国电影排山倒海过来，电影过来，把你吃掉，软实力过来，中文现在挡不住，有一天中文被这些

低头族掌握的时候，或者被比尔盖茨在开发出来一个词库，这个定型了以后，我告诉你，坏的中文就定型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现在中文还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文真正的决定权在我们，他们也会跟我抢，可是抢没有用，你没有李敖，李敖在这里。

T05-视频

李 敖：诺贝尔学院前，我们都可以提名，那写本书啊，因为大学的语文系教授，任何大学的语文系教授推荐你，就构成提名，诺贝尔奖提名极为容易，问题两点，第一点，你这兄弟不好意思送进去啊，可是你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第二点，提名归提名，入围归入围，当选不当选啊，这三个是不同的层次，提名就等于登记，额外你想提名，一说一定得提名，你就说我被提名，的确被提名，也不是假的，入围就是他选出来一批人，经他这么一精选，（等于是筛选了）你要这个，这个就很难了，最后，开奖了，只有一个一名得奖了，我跟你讲，没有同时给两名的，另外一个层次，可现在我们知道，在摸清楚了他大概的情况就是你不出卖你的祖国，你就得不

到诺贝尔文学奖，至少对中国是如此，过去对苏联也是这样子，你不来，你不跟你祖国过不去，你就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T06-视频

李 敖：中国的宪政开始改变的时候，当时作为（先锋的）北京大学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有一个杂志叫做《新青年》，当时《新青年》全国只不过卖了两万多本，可是那时候因为没有其他的媒体，所以它变的非常有影响力，胡适他们认为我们中国应该是继续和平改革，可有一批人他们认为应该搞革命，1920年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继续搞革命，现在既然革命成功了，中国到了今天，还是要回头去建国，汉朝（有个人）叫“陆贾”他跟刘



《新青年》

邦讲的话，劝他，刘邦说：“乃公，就是你老子，说话了，老子马上得天下，骑着马得到天下的”这个陆贾说：“你不能够马上治天下”。你得下马来，找专家来治天下，刘邦就懂了，所以我们治天

下的时，还需要一种，英国式，美国式的建立现代的这种民主国家的这种方式，所以胡适又变得，那种路线，又被我们重新肯定了，所以我为什么很恶作剧的，捐了钱到北京大学，要给胡适立个铜像呢，就是给共产党看，你们现在他的书都不查禁了，可是这个人你们还封锁，这个人不要封锁了，他是北大的老人。

《李敖大全集》版本研究

爱华山櫻

从下图可以看出，1995 年出版了《李敖大全集》第 1-20 册，1999 年出版了后 21-40 册。这 40 册应该是红皮版本。

李敖大全集典藏本 1000 套

梁實秋三十年前跟李敖說：「人過六十，誰比誰先死都不知道。」一轉眼，李敖年過六十了，李敖怕他比別人晚死，決定先出《李敖大全集》給自信可活過六十歲的人看。因此，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的，不可不看；而已經活過六十歲的，要看快看。

為什麼不叫全集而叫大全集？太不謙虛了吧？李敖說，我是很謙虛了，只叫《李敖大全集》而不叫《大李敖全集》，就看出我多麼謙虛。何況，自宋朝范成大《石湖大集集》到元朝胡祜遇《紫山大全集》、劉明朝高啟《高太史大全集》，都是大大大大出現的，李敖只是發願八百年來你大我的傳統而已，你少見多怪什麼呀？

李敖曾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裏ㄘ前唱ㄘ陣位。」——這段名言，看起來又不夠謙虛，但李敖說，我是很謙虛了，本來三千年內白話文的前三名都是我的，我只寫五百年，少寫了兩千五百年，其謙虛可想！

《李敖大全集》收有發表的和沒發表的著作、查禁的和沒查禁的著作，文章千變萬化、出神入化，種類面面俱到，一應俱全。舉凡思想、歷史、自傳、小說、雜文、隨筆、評論、書信、詩歌等等等等，都自成一派，並且是大家的。唐宋兩代才不過出了八大家，但是六十歲後的李敖卻以一當八，不但自成李一家，並且超過了古人和今人。

李敖的喜劇是他的文章千古流芳；李敖的悲劇是他的讀者望而卻步。英國戲劇家王爾德抱怨他的劇本好極了可是觀眾糟透了，李敖的抱怨是他的文章好極了可是讀者只摸了一條蟲。

李敖是龐然大物。李敖是大家。過去以為看過他的書，其實只是讀子孫家。快來買《李敖大全集》吧，這是你睜開眼睛唯一一次得窺真象與全金的機會。《李敖大全集》典藏本初版只印一千套，直接郵購，不在書店買，別以為一千套很多，馬克思的《資本論》初版只印一千套，就鬧得雞飛狗跳、天下不寧，如今在人間，只剩幾冊而已，已成奇珍。搶購一套《李敖大全集》吧，說不定將來在國際拍賣會上，你還可以奇貨可居，大發奇財呢！

這次出版《李敖大全集》，共分兩類：一類是珍貴本，因為四年前《李敖大全集》出版時只推出 1-20 冊，這次珍貴本是 21-40 冊，專門供應給買過 1-20 冊的讀者，每套定價 16,800 元，劃優待價 13,500 元。另一類是典藏本，專門供應給沒買過 1-20 冊的讀者，全套 1-40 冊，定價 33,600 元，劃優待價 27,000 元。以上兩類劃優待價至 6 月底截止。劃優待號：【00068367張桂貞】。

眾所周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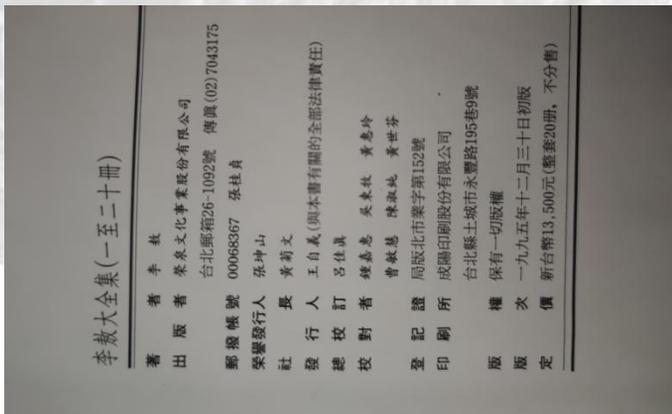
1995 年出版

1-20 冊時的出

版社为荣泉文

化事业股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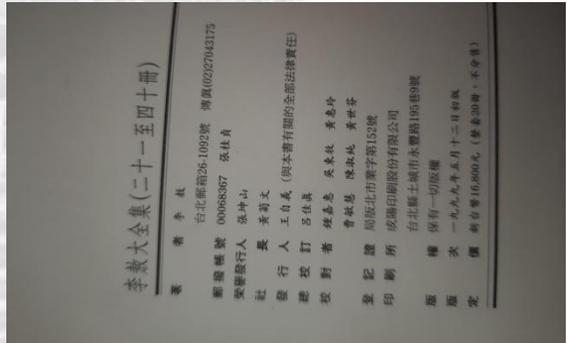
限公司。



1995年（民国八十四年）六十岁。3月5日在新光美术馆举行——为章孝慈筹款拍卖会，李敖捐700万元给东吴大学，由东吴自行决定在章孝慈医疗基金、兴建女生宿舍、章孝慈人文精神教育理念推广上的分配比例。另496万9000元，李敖则决定自行调配用做笔枝捐赠、二二八族群基金会及子女教育基金，并捐出自己任敖新得薪水。自1996年10月20日起主持《李敖笑傲江湖》，每周一至周五，每日22时至22时30分，播出三十分钟，每年260集。替苏荣泉老婆要2亿3790万保险赔偿，拿出十分之一送给李敖，在12月30日出了《李敖大全集》1-20册。

但问题在 21-40 册，我自己收藏的大全集的版权页没有写出版单位。

从李敖秘密书房第二集秘密书房秘密宝里



面李敖本人的说法，《李敖大全集》存在真相新闻代为出版的情况，所以我猜测 21-40 册的红皮大全集为真相新闻出版。

为什么用这么多笔呢？原因就是我的写作量很大。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真相代为出版并且销售的《李敖大全集》，已经四十本，写了一千五百万字。因为我写这么多的书，所以我要不断的用不同的笔来写，变换我手上的姿势。好比说用毛笔，我都这么写，对不对；用原子笔就这样写；这手的姿势会变，减轻我的手指上的负担。所以我的稿子很有趣，一会儿是毛笔，一会儿钢笔，一会儿原子笔，一会儿签字笔，很混乱的。我的习惯当然都是坐在这里写，当然有的人习惯不一样，像美国的文学家海明威，他写稿子是站着写的，并且是用铅笔来写。可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呢？他们每天平均只要写五百字就够了。我们写作量很大，有时候写一天写几千字，甚至写过上万字的记录，所以不能够那么自在的一个自在的姿势来写文章，我们写文章也是蛮辛苦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否存在成阳出版的 1-40 册红皮大全集，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原因如下：

下图说的典藏本应该是指黑皮大全集，因为我找到了黑皮大全集的版权页，就是 1-40 册，33600 新台币，链接如下：

雅博客台大店-【李敖大全集】共 40 冊(第一冊簽名)成陽出版,
(直購含運)實體店面同步販售, 下標前請先提問確認有書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23931477867>

如果有人现身说法拥有成阳出版的 1-40 册红皮大全集, 那我就错了。

李敖大全集典藏本 1000 套

竊寶軒三十年前贈李敖說：「人年過六十，誰比誰死都不知道。」一種釋，李敖年過六十了，李敖怕他比別人晚死，決定先出《李敖大全集》給自信可活過六十歲的人看，因此，從十六歲到六十歲的，不可不看；而已經活過六十歲的，慶幸快看。

為什麼不叫全集而叫大全集？太不謙虛了吧？李敖說，我覺得謙虛了，只叫《李敖大全集》而不叫《大李敖全集》，就看出我多麼謙虛。何況，自宋朝范成大《石湖大全集》到元朝胡祜通《家山大全集》、到明朝朱敬《高太史大全集》，都是大大大大出現的，李敖只是發掘八百年來你大我的傳統而已，你少見多怪什麼呀？

李敖會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裏可佩服得拜位。」—這段名言，看起來又不夠謙虛，但李敖說，我很是謙虛了，本來二千年內白話文的前三名都是我的，我欠債五百年，少算了两五百年，其謙虛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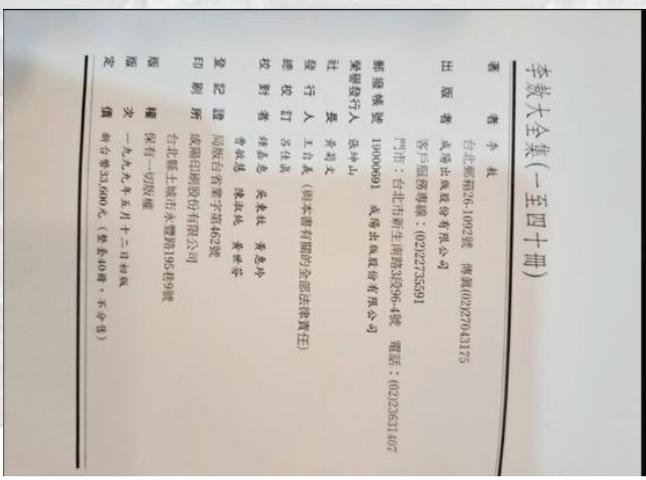
「李敖大全集」收有發表的和未發表的著作、喜祭的和沒喜祭的著作，文章千變萬化、出神入化、種種面面俱到、一體俱全。舉凡思想、歷史、白傳、人物、小說、論文、隨筆、評議、書信、詩歌等等等等，都自成一家，並且是名家。唐宋時代才不遺出了八大家，但是六十歲後的李敖卻以一篇八，不但自成一家，並且超過了古人和今人。

李敖的喜劇集他的文章千古進步；李敖的悲劇集他的讀者望而卻步。英國戲劇家王爾德嘲笑他的劇本好看了可是難得禮送了，李敖的悲劇集他的文章好看了可是讀者只領了他的一條筋。

李敖皇皇然大和、李敖皇皇大章、過去以為熟識過他的書，其實只是瞞子騙象。快來買《李敖大全集》吧，這是你離開閱讀唯一一次得真真與金金的機會。「李敖大全集」典藏本初版只印一千套，直接郵購，不在書店賣，別以為一千套很多，是香港的「資本論」初版只印一千套，就傳得雞飛狗跳。天下事，如今在人間，只剩得雞飛狗跳，已成珍稀。搶購一套《李敖大全集》吧，說不定將來在國際拍賣會上，你還可以奇貨可居，大發奇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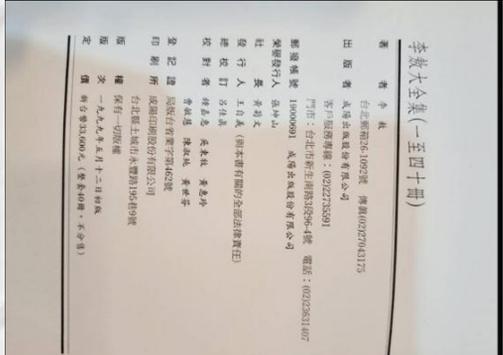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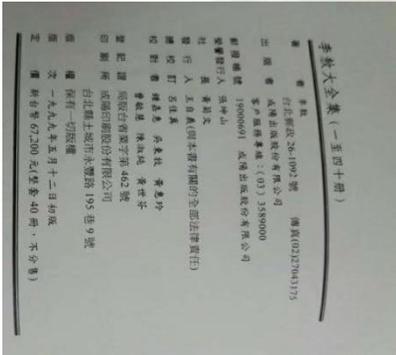
這次出版《李敖大全集》，共分兩種：一類是綠版本，因為四年前《李敖大全集》出版時只推出 1-20 冊，這次續續本套 21-40 冊，專門供應給買過 1-20 冊的讀者，每套定價 16,800 元，劃期優待價 13,500 元。另一類是典藏本，專門供應給沒買過 1-20 冊的讀者，全套 1-40 冊，定價 33,600 元，劃期優待價 27,000 元。以上兩種劃期優待至 6 月底截止。劃號帳號：【00683675 蔡姓】。

另外, 1-20 册
版权页的价格是
13500, 21-40 册版
权页的价格是
16800, 加起来不
是 33600。而黑皮
大全集的版权页



价格是 33600, 所以那 1000 套典藏版大全集指的是黑皮版。

最后一个问题是，黑皮大全集的版本也有不同，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如下两图都是黑皮大全集的版权页。不同在出版者那里以及定价。不知道具体出版情况是怎样的。



图一链接：

<https://tw.shp.ee/YwQm5Qy>

图二链接：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23931477867>

总结：

1. 存在成都出版的1-40册红皮李敖大全集，红皮只有1-20册荣泉出版+21-40册真相代为出版。
2. 1000套限量版大全集指的是1-40册黑皮大全集。
3. 黑皮大全集有不同的版本，价格相差一倍。

《许倬云谈话录》提要

辰之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初版。许倬云祖籍江苏无锡，民国十九年九月三

日生于福建思明。其父许凤藻（案：生于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八日，卒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曾任联鲸舰、楚有舰舰长、中华民国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海军部司长，官至海军少将，后从事海关及外交方面工作，一九四九年赴台后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地方党部小组长、主委，与其妻章舜英（案：章鸿逵之女，生于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四日）俱出身无锡世宦之家。



许倬云

(1930-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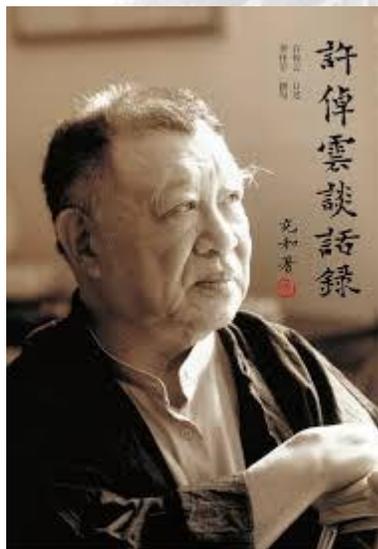
许章二人共生有三女四子：长女许留芬、次女许婉清、三女许有榛、

长子早夭、次子许庆云、三子即许倬云、四子系倬云双胞胎弟弟许翼云。许倬云虽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但还是在学界取得了一番作为，其先后取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国立台湾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一年后赴美留学，并取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案：许氏赴美留学之资还是胡适出面借来的）。回台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通信研究员、特聘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讲座教授，并在匹兹堡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编著有多部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相关著作。二〇二五年八月四日在美国去世。

许氏此书，前半部分自述身世，后半部分由李怀宇（案：李怀宇亦属南方系报人出身）记述杂感。若以匹夫之见，此书不过一身残志坚老学者追忆往昔之作，读者自当边擦眼泪边拜读才是，然而李敖的一纸诉状，却打破了许倬云和他信徒们的这一美梦。

许倬云在书中对李敖污蔑颇多，如“姚从吾捧李敖，是拿李敖

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案：其意即李敖给国民党势力当打手，岂不可笑）。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李敖聪明有余，没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



《许倬云谈话录》

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

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等内容，言辞险恶可见一斑，遂被李敖具状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及刑事诉讼。

此官司先后历时数年，最后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台北地方法院依照《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诉字第二〇八一号民事判决》判处许倬云赔偿李敖新台币二百万元，并需在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报、人民日报六家报纸登报道歉。另据《李敖风流自传》《虽千万人，李敖往矣》等书及其在《正晶限时批》《改变的起点》等节目所述，许倬云私下赔偿当为七百八十万（案：约称八百万），一说系由于许倬云畏惧刑事罪名或可导致入狱，故而与李敖加赔私了，而后李敖也主动取消了刑事控诉。

以许倬云之地位、声望，其言语自然分量非轻，可谓“一字之嘉，有同华袞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故更应注意对他人之评价。许氏须知自己任何一句闲言碎语，都会被信众当成圣言子曰般引以为据，岂可不诫之。其书中对李敖评价诸语，诚可谓恶毒之至，换为他人足以因此身败名裂，而如果李敖是一好好先生、或一怯儒、或一早死鬼，则因许氏言而攻讦李敖者将不绝于其身后，所幸李敖是李敖，对此类无端污蔑不做“不回应”、“不接招”的

高姿态，大发讼性，才使得许倬云这个身残心更残的大学者露出了本来面目。

李敖对许氏书中内容一一驳斥，证实其皆为不实之言，其内容皆在《李敖控告许倬云造谣诽谤》一文当中，在此不一一罗列，许氏说法或因循文化论战之余尘，或学舌萧孟能案之闲言，皆甚不经且无新意。唯指斥李敖偷书一节，在他人书中鲜少涉及，盖属倬云



王力宏与其舅公许倬云

先生一大历史发明，然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许氏人格之卑劣。不同于其他内容，此部分在对李敖“种种恶行”不齿的同时，还反衬出了许氏之清高。因不满李敖之为人而以不盖章的

手段让其不能毕业，这样的故事一出，使得许氏那不足一米五的身高越发伟岸了起来。可事实上，李敖念研究所时明明是自动休学后因未按时复学而退学，与许倬云的章子有什么关系呢？且最严重的

是，许氏为了编排这一段贬损李敖人格、抬高自身形象的故事，竟不惜更改自身履历，将当时的台大历史系副教授许倬云硬生生提拔成了台大历史系主任许倬云。历史家捏造历史本就是大忌，许氏竟直接捏造自身历史，凭借着这种与众不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亦无怪乎其可成为“大历史家”。

此外在案发时，许氏还第一时间将责任推给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李怀宇身上，言明自己曾让李怀宇不要将涉及李敖等内容写入书中。然而李敖在获得该社及李怀宇与许倬云联系之电子邮件及声明后，证实许倬云实乃于案发之后才要求出版社删除此部分内容（案：见中视新闻网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许未要求作者删文导致调解破局》）。身为一个“誉”满寰中的“史”学大家，一出了事就推到他人身上，不肯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真是毫无担当可言。如果连自己的责任都承担不起，他这位大历史家又如何承担得起千古兴亡。

回想李敖与许氏之矛盾，盖始自文星时期。据《李敖快意恩仇录》所载，在李敖主持文星之初，许倬云曾卖力“巴结”李敖（案：

当时文星杂志中即收有许氏多篇文章，文星书店还曾出版许氏之《心路历程》），但后来由于李敖痛批台湾教育界，尤其是批到台大的李济、沈刚伯等人，因其都是许氏的老师兼顶头上司，许氏便决定以学院派身份出面调解。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五日，许氏约请李敖、萧孟能、余光中等至其家中洽谈，许氏在谈话中无非以学历资历压



萧孟能
(1920-2004)

人，欲充老前辈姿态，结果搞得“互恶声相向”，最后不欢而散，双方也自此结怨。

此后许倬云也曾多次与人暗中贬损李敖，如其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写给孟祥柯的信（案：此信系由兰台艺廊 May 所藏，见于《刘绍铭、萧孟能、许倬云信札三通》一文）中称：“李兄（案：即李敖）事，恐不可能，因彼从未执笔做过正式象样的

学院式研究论文，一切文章均为杂论式，我们无法为其订一专长，更不论执教的科目矣。大学中教书，事体与新闻记者不同，未可用‘文笔’作为条件。至于所谓‘仇敌’云云，以弟看来，彼我之间

未有‘笔仗’，有之亦只是他一面之辞的谩骂而已”。

此类消息后传至李敖耳中，李敖遂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写去了那封“倬云呀倬云……祝你不要撞车”的妙信，回应称：“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著作’指的是什么？大概是你们南港和罗斯福路四段学阀们所谓的‘学术论文’罢？如果是这一套，那太容易了！你看过我的毕业论文吗？我的毕业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得了九十四分，已被我发表在我的《历史与人像》里，比起你那八十八分的不敢发表的毕业论文《中国古丧礼中殡制探源》，你不脸红吗？”

此外，李敖信中还揭露许倬云诸多劣迹，如“抄李玄伯的著作”、将女秘书蓝小姐“逼婚得下海做舞女”、“整天接送居浩然的女儿，招摇校内外”等等，亦属许氏醉心权色之侧写。

之后二人也再难有好话。李敖曾先后撰写《可耻的“拥戴”》《斥许倬云的谄媚之言》《再斥许倬云的谄媚之言》等文，揭露许氏的“蒋经国基金会董事兼美国评议委员会召集人”身份，批驳其“谄媚”小蒋与“拥戴”李登辉为总统之事，并对其剽窃李玄伯和

误将王导当成“王道”的谬误加以讽刺。又写下《李济、许倬云怎样拿钱不办事》《从许倬云逼婚谄上看国民党学人品格》《许翼云许倬云哥俩好无耻！》等文，对许倬云尸位素餐、逼良为娼、见风使舵（案：张学良晚岁恢复自由，大排九十寿宴。《中时晚报》彼时采访到许倬云，许氏称：“蒋中正先生是个固执、专横的人，器量狭窄，而西安事变确切可知的结果，是国民政府对张先生背信，



许翼云夫妇

这是一个事实”。许氏此言虽不虚，但以许先生之地位影响，何以目睹这一背信达数十年而不置一言，偏等到党禁报禁解除，等到张学良

重见天日，才来做这番历史公论。夫历史家，不应等到“现在的”变成了“过去的”时才站出来说话，只会对死人耍威风的历史家，不要也罢）及其弟许翼云贪图名利之事多所批判（案：李敖曾邀请好友孟绝子上《李敖笑傲江湖》开讲钱学森，节目中谈及许倬云之

弟许翼云，孟先生怒斥道：“那个许翼云那个时候是有美国国籍，在美国要退休了，提早退休，赶快回来抢这个位置。大家说：你有美国国籍，他就说一句话：只要你们把这个位置给我，我立刻就放弃美国国籍。这个是什么话？目前在台湾很多科学界工作的人，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把青春献给美国人，等到老了，退休了，美国人不要了，再回到台湾来抢这个位置”）。

而许氏在北大二院历史系讲《系统论与历史研究》时，于答复环节也针对李敖做出评价，虽称其聪明、敢说话等，但依旧恶评其“不过他只能做些很细的东西，宏观的他不行。而且，使用材料不诚实”，接着又称李敖偷书，自己没给李敖盖章使其未能毕业（案：前脚刚说李敖使用材料不诚实，后脚就用自己捏造的履历和编造的故事来攻击别人，许大历史家真不知面皮为何物），又称李敖捏造其与舞女跳舞（案：李敖信中明明写的是逼得女秘书蓝小姐下海做舞女，如何到许氏口中就成了和舞女跳舞？许氏不过是仗着自己先天残疾，想借此曲解李敖原话，使李敖之说显得荒谬。许氏捏造自己的材料还不过瘾，还要捏造别人的材料，恐怕其在历史家之外还

身兼编剧与发明家），又称李敖很恨自己的父亲李鼎彝（案：哪家恨父亲的孩子会为父亲出版著作？会背负着父亲的骨灰去大学？会在各种文章、节目、演讲中扬父之名？），凡对李敖稍有了解者，一听便知此皆荒谬绝伦之事（案：此外唯其称诺奖提名容易一事尚不为虚言），许历史家拿这些谎话来蒙骗好事学生尚可，一遇到到李敖，就只能乖乖赔钱道歉了事。

然而即使在赔钱和登报道歉后，许倬云依旧心有未甘，依旧在各种访谈、论著中褒贬李敖，甚至直到今年出版的《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一书中，仍有贬损李敖的文字出现，诚可谓贼心不死。所谓“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需知贼的牙口再好，也总有咬不动的一天。可若是被“神龟”咬上一口，即便当时你把它打翻在地，它也会翻过身来耐心等待，等你死了，它再对你的尸首咬个不停。即使有一天它“犹有竟时”了，也会有它的“徒子徒孙”来接棒咬下去。

许倬云享寿九十有五，虽不中其“拥戴”的“李前总统登辉”先生，但亦不远矣。二位老人一在学界一在政界，将宛如两颗璀璨

星斗般在人类的道德分野上交相辉映。近年来，许氏热衷于媒体平台传道授业，先是在另一许姓文艺中年的《十三邀》节目上俘获了一众大陆粉丝（案：查其粉丝水平，颇近乎早年南怀瑾、曾仕强等在大陆的粉丝，应以“信徒”称之更宜。即如许李一案，就不乏许氏信徒称“李敖在学术上给许倬云提鞋都不配”，足见其信徒之愚谬。且不问许倬云究竟有多少东西担得起学术二字，仅就此案而言，



与学术可有丝毫关系？依许氏信徒之见，一“术”遮百丑，论文和专著成了他们的丹书铁券，有学术的学人就可以借此做些有违道德的事了。许氏信徒可真给许倬云上了一课，如果当年许倬云逼婚蓝小姐时大喊：“呔！我乃是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

《万古江河》

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

研究员，著有学术书籍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不计其数，你个毫无学术的小小秘书还不依了我！”，又何愁蓝小姐不投怀送抱），后在

视频平台开课讲授历史，但被观众发现谬误频出，如称葡萄牙位于地中海里面（案：许氏地理水平似乎不佳，海心兄于许氏去世当天读其最受欢迎之著作《万古江河》，未及数页便发现了书中“长江黄河都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谬误）、蔡锷创立云南讲武堂等，足见其水平之高下。又时常拍摄鸡汤视频，专一毒害广大青年，其中或称“被人诬陷、诽谤的苦，我受了至少有七十年”，颇有几分倒打一耙的意味（案：这也是许氏的一贯手法，以受害者自居，但又不寻求报复，这样既有了格局和姿态，也不愁信众为其辩经。加之许氏先天残疾，既可以其残躯包藏其祸心，也容易博得旁人同情，而与这样先天残缺者论辩之人也就自然站到了道德洼地上。李敖即曾明言：“你本是残废之人，又会装出一副可怜相，我一骂你，人家就劝我‘不要欺负他’，殊不知你专门欺负人”，可谓至论）。

许氏去世前一年荣获唐奖，若依其学术水平观之，得此奖已不免使人生疑，而若依其形象观之，则更使人疑惑唐奖二字之间是否少了一个氏字。其实身体上的残疾，自不应该成为他人嘲笑的理由，可当一个人心理上的残疾远比其身体上的残疾严重时，只去嘲笑其

身体残疾，竟也成了一种变相的关爱（案：撰写此则时，许倬云尚在人世，后逢其亡故，又加修改）。

（本文选自《李敖相关书目编年提要》）



胡茵梦的美丽与哀愁

唐玉瑛

胡茵梦是个令人心折的女人！

从昔日不食人间烟火，长发飘逸的女郎，到今天短发俏丽，有另一股成熟女人的风韵，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典型，胡茵梦依然使人砰然心动。

前一阵，录「慈禧外传」时，每晚八点她总会在台视中和棚的控制室里，正襟危坐、聚精会神的看「慈禧外传」的播出，并不时的提出她的看法。

「星期五的广告，比较有水平耶！」「不能老把光打在我一人的身上，别人都暗暗地，这是不对的。」「出外景时，拍得那场有阳光的影子，好美哟！」对戏剧的演出，胡茵梦是相当的投入。所



胡茵梦

以不管多累、多疲倦，她都要打起精神来看戏，揣摩戏的每一环节，看她卯足了劲的全神贯注，谁能说她饰演慈禧不够分量呢？

她充满着信心，振振有词的说：「接这档戏，感觉上很得心应手，没什么压力。基本上慈禧是当时那个时代中，具有现代感的女性，因此以现代女性要去诠释这个角色，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对胡茵梦而言，要表达慈禧的厉害，并非在表面而已，她是以一种「内敛」式的表演方式，把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诠释得非常传神。



李敖前妻

美丽后面有哀愁

这么一来，她那如「茵梦湖」般的深邃眸子，可是派足了用场，「用眼神来演戏。」是胡茵梦的看家本领。这对「梦幻式」的宝贝眸子，可是三百多度的近视外加散光的，而且相当的敏感，不能戴隐形眼镜的，无怪乎胡茵梦的世界永远像是在「雾里看花」。

从和梁修身搭档演出的电视剧开始，到和田文仲的「碧海情涛」，到现在的「慈禧外传」，胡茵梦一共演过三次电视的连续剧，虽然拍摄的过程很辛苦，不过她的感受却很愉快。她说：「拍电视剧时，大伙儿日日夜夜相处在一起，像个大家庭般。」事实上，任何人一到台视中和棚，立刻都可以感受到那股「家」的气氛，而流连忘返的。

胡茵梦的「美」是难以言喻，而且很「古典」的，被喻为影坛的「胡大美人」，然而对于别人所加诸的赞美，她却颇不以为然的说：

「七岁的时候，左邻右舍给我取了个外号——小胡大脚，那麻杆腿下的大脚丫，不折不扣的遗传自老胡大脚——我那貌似葛雷哥莱毕克的老爹。我的飞机场从十岁以后，就未曾改进过，这大概是我到五岁还不肯断奶的报应。」



《梅花》女主角

「相书上说，双眉距离远的人，心胸宽大，而我的眉心平坦宽阔，是可以通行一辆坦克车的（应该是指玩具坦克——编按）。我那对被人形容为迷蒙深邃的灵魂之窗，实际上是近视加散光的结果。只有一头黄毛和双手，还称得上是柔软光滑、纤细修长。」

你可知道在美丽的外表下，可能藏有多少的哀愁呢？



璩诗方、胡麇年和他们的女儿

就让胡茵梦来告诉你吧！「智者曾说过，做为一个公认的美女，意味着你将是大部分男人的猎物，和所有女人的公敌，

这句话也许过分，却有部分的道理存在。

「因此当别人没有忘却你的外表时，特别是演戏，导演要求你，笑的时候嘴不能歪，哭的时候眉不能皱，演穷人家的女孩也要漂漂

亮亮的，你必须是完美的，时时刻刻是完美的，永远是完美的，于是你成了最完美的『木头演员』。」



辅仁大学校花与父亲

「我记得刘维斌导演和画家席德进都说过，我拍过的所有影片中以某一种洗发精的广告最好，因为它拍得最美（多么悲哀的成就啊！）于是你命中注定，只能做个没有生命的演员。除非有一天，人老珠黄了，而中国电影观众已经进步到可以欣赏老牌好演员的境界时。你才有发挥演技的希望。」

从不吝啬泪水

从在辅大念书，演出徐进良的第一部戏「云深不知处」开始，转眼已过十二个年头。而胡茵梦总感叹着自己的戏剧潜力，无法发挥，老在戏中当个「花瓶」，直到「海滩上的一天」，整个戏的完美组合，才让她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演电影，在剧中她精湛的演出，「木头演员」之说也不攻而破。

「音乐」在胡茵梦的生命中也占有很重的分量，尤其是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的音乐课上，那一幕的回忆最令她难忘。

谈到这，她彷彿跌入了时光的隧道里：「记得那时唱游课，照惯例是要学生上台高歌一曲的。当时七岁的我，是多么为自己的歌喉骄傲，不等老师点名，就飞奔上台了，当我唱得正起劲时，突然发现台下的臭男生，全用手堵住了耳朵。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说，胡因子的声音太大了，耳朵都快被震破，从此男生们改称我为『雷



胡星妈与女儿

婆』。小时的我，并不是那么受异性欢迎的，不过对于自己的大嗓门，却颇为自满的。」而昔日的「雷婆」其歌喉可真是每下愈况，现在却自称为「不会唱歌的人」，过去的光荣记录只留给记忆吧！

胡茵梦很瘦，是标准的「林黛玉」体型，所以平常的她，喜欢穿宽宽大大的服饰，颜色也偏向古旧的深色调，因为她觉得「老古董式」的衣

裳，它的质感及色彩俱佳，远超过现代精工下的衣料。「喜欢怎么穿就怎么穿，只要自己穿得舒适」，是她一贯穿着的原则。



有智慧的新女性

感情易动的她，对于泪水是从不吝嗇的，有时在剧中得表达些大喜大悲的情感时，她还会藉自己的想象，只要让她一想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死了一地的人的那种惨况时，她的泪水就自然的流个不停。

「感情」一直是胡茵梦所避讳的话题，一次和李敖婚姻的失败，竟然意外地治愈了她二十多年的忧郁症，使她恍然大悟的发现自己面对打击与挑战的反应，竟是如此

坚强，对生命的基本态度又是如此乐观。

不管是和王冠雄、李敖或是傅聪，每一次的恋爱，胡茵梦都是相当的「投入」。「不过这一切都归之于缘分」，因为正如她所说的——人是变量，将两个变量凑在一起而期望它永恒不变，那真是天方夜谭。

胡茵梦的皮肤很好，称得上「娇嫩细致」，也是化妆品公司力邀的模特儿。现在她正是嘉丽宝化妆品公司的亲善大使，问她有无什么特别的保养秘诀，她说：「适当的睡眠是很重要的，我每次都定期的以保肤棉来强化皮肤的新陈代谢，除去多余的角质层，再以中性的洗面奶洗净，没用什么特别的方法。」



“台湾四大美女”之一

自我期许要写作

胡茵梦也是极富「母爱」的，她的两个宝贝孩子——暹逻猫，可是被她奉为上宾的。在胡家，猫儿真是无法无天，甚至可以与她



第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共眠。在胡茵梦的眼中，猫儿是十分具有「灵性」的。就有一次，因为女主人出国拍戏，有一只猫儿还为此而「跳楼自杀」，为此让胡茵梦心痛不已。

对于「记者的采访」，胡茵梦总是筑了道厚厚的墙。因为她早已厌倦了同样的宣传，一样的对话、照片、剪报、纪念品对她都不具备任何的意义。

「我曾经和采访者努力的合作过，然而他们还是写不出来我真实的看法，干脆由我自己动手。」「胡言梦语」、「茵梦湖」两本书也因此诞生了。

在戏里，胡茵梦曾是个「活慈禧」，而在戏外胡茵梦的口中，胡妈妈也是个标准的「慈禧太后」。「妈妈有时很明智，有时却也



很专制，她除了掌管这尼姑庵（家里五口，人三个，猫两只，全是女的或母的）的大权之外，偶尔也搓搓麻将，平常就以数落大白痴（指胡茵梦）和小白痴（指猫）也算是一大乐趣。」但这两个「主观意识」都很强烈的一对母女，平常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

对今后自我的期许，胡茵梦将专心写作。她不自视为一名作家，只自称为一名爱发言的演员，每当扮演「他

“慈禧太后”扮演者

人」感到倦怠和寂寞时，偶尔也藉写作来饰演一下「自己」的角色，道出一些自己写的台词而已。

她常说：「这是一个相对的宇宙，人生根本是个幻像。尤其活在掌声中的人，要洗净自己的耳朵，仔细听听有多少是盲从的，还是只有自己的掌声最为可靠。」对胡茵梦而言，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她是个不太有过去的人。



胡洁生之母

人生的潮汐有高有低，起伏伏的。不过对胡茵梦这个「梦幻式」的美女而言，在她心房的一角，总有个不散的「嘉年华会」，支撑着她来迎接着每一个狂热的周末！

给李敖的信

吴子尤

李敖爷爷：

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的这封信。早在今年3月末，我就准备动手写它，那时我还是14岁。五十六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在奔波流离，逃难去台湾的路上。

4月10日的生日一过，我就15岁了。前几个月发烧发得昏天



吴子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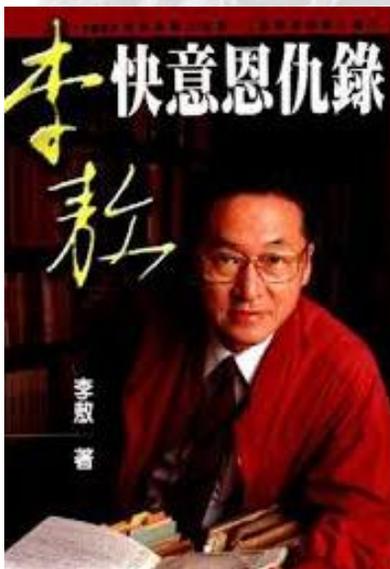
(1990-2006)

黑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干的人，就把妈妈刚买的《李敖回忆录》和《北京法源寺》看完了，觉得很不错。《李敖回忆录》看到写马占山一段，我觉得好，念给妈妈听，还没念完就哭了。您的文章

字字都喊在我心里，所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第一二三”之说看来是实事求是！我在书的目录一页曾写下这样的感言：

3月27日读完，其间发烧严重，几次停止，今天趁两手不输液，看完最后一章，看完忽出一语：“浩浩荡荡。”

后来又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看，感觉很爽。我只要关注上一个人，就会努力了解他，见



识了您的有趣后（我是最喜欢有趣的人），我想到应该给您写信，问候一下。去年三月份，我被检查出胸腔长了一个肿瘤，且为恶性，之后就是漫长而让人回味的治病过程，一个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李敖快意恩仇录》

我是在《李敖有话说》开播后不久

就发病了，所以可以说，您的挥洒伴随了我的整个生病过程，化疗

时，病房条件好，有电视，每天看您的《李敖有话说》是必不可缺的。电视里，您指手画脚，以嘴为刀；电视下，我在病榻上读书，以笔为刀。

我觉得咱俩有一个非常像的地方，您也是做过手术的人，但永远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谈笑风生的样子，我也如此。您总在电视上时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字，说它“一极棒”，但我妈妈觉得她的字比您好，而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还好，所以我们家人的字已不是“一极棒”能形容的了，而是一家子“超级棒”！

《李敖回忆录》里对教育的议论我很有体会，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工作，采访身边的朋友，对初中三年做总结，虽然我初中只上了一年半，但其厌恶之情却时刻闪耀心头。您在残存记忆里，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教育也比台湾好，但现在我要对您说，我们的学校生活是恐怖的，可怕的，我所指的恐怖、可怕，更多是说，学校将我们的思维禁锢，塑造成一个个听话、认真的考试机器。

北京的学校与您那时大不一样，除了我们也会有初恋情人，也会有自己的“张敏英”，其它的没什么相同之处。老师呢，当然负责任的居多，但不会在课外带我们念古文，念无聊的课文倒是很多。这样日复一日学习课文的结果是，同学们忘了什么是优秀的文章，



也不会写优秀的文章。您在电视里，遇到自己写的好文章，会一而再，再二三地念给观众，那是真诚地欣赏呀！要是课本里能多来些您那样优秀的文章就好了。我真希望您在牢里给女儿的那些信是我们的教科书。

《李敖回忆录》

考试作文培训出来的，都是冷冰冰的字句与冷冰冰的人，没有感情，没有感情！

这是多么可怕呀！生病后，我偶然参加了一次题名为“爱的教育”的作文比赛，那时我身体极差，心想自己写作这么好，没参加过比赛怪可惜，也不知道别人的写作程度怎样，抱着这种态度，我往他们的邮箱里石沉大海地发了两篇，有一篇得了个三等奖，奖品是获

奖作文集成的一本书。遍视全书，那些作文是怎样表现“爱的教育”的呢？多数都是些发现一只病猫，带回家养，最后猫死了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爱！没得奖的那篇与我的得病经历有关，我猜想它没被选上的原因是，考官们看了太多虚假编造的作文（据说高考作文会出许多死了爹妈，自己有病的内容），这回看见我一个真的，还不太相信。

对我参赛作文的评语很给我启发，那就是我的作文有冲击力，其实冲击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写作不就是为了震撼人心吗？可平时，考官们要的不是有冲击力的挥洒文章，而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文章，那样的文章有满分。

老师给我毕业卷子做，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讲述自己人生中的潮汐与浪涛，与海底中蕴藏的珍珠。”我是正好经历丰富，有可写的，我的一个文学好友写了一场足球比赛，那就是他们人生中的跌宕起伏。

在北大住的这几个月，使我很有感触，很想提笔写它。在这儿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对周围的情况视

而不见：一群人总在特定的时间练怪怪的功；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总在树林里认真地念英文，念得很差，却让我感动；有个总是坐在未名湖边的人，将给过路人画画当成自己的职业，虽然我们觉得他画出的人长得都差不多；路灯下，有个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用压变形的声音朗诵话剧，情景异常诗意……这样有趣的风景还有很多，我坐在轮椅上由妈妈推着走恐怕也成了校园风景。

我的同伴们正在为中考（升高中考试）结束而庆祝，今天看电影，明天去海洋馆，当成绩公布时，几人欢喜几人愁。我走出学校快一年半，养了一年半浩然之气，世界与他们有很大不同。您可以大胆而自信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最佩服的，心里很向往那种世界尽在我手中的气魄与境界。但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的世界尽在学校手中，老师手中，家长手中，分数手中。

我知道您写过一本《教育与脸谱》，一直想找，但是好像我们这儿没有卖的。另外顺便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像写《胡适评传》这样的书您要做多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工作呢？

李敖爷爷，我想，您大概该安心歇下来写一些作品了，写一些传世之作，您的身影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丰碑，您的作品呢？既然国民党是那样丑陋不堪，您也不必将一辈子花在上头，那样岂不是太亏了？



我要出书了，到时候让您看看年轻一代的生活与思想。写这么一封信，是一个小北京人在跟一个老北京人谈天。五十二年前您给钱穆写信，如今写信问候的变成了十五岁的少年，收信的是个七十岁的老爷爷。时光如梭，您那传统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的身影在我这一代恐怕是找不着了。我们看不见值得尊敬的饱

学之士，固然那些饱学之士仍能被您挑出弱点，但他们至少饱学，而我们不饱，我们很饿，我们只能崇拜唱歌的，熟练记忆着满是语病的歌词。同学中也有人忠实地看您的电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让思维开阔，让眼界开阔，让人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自由地思考。

我这信写了好几个月，想到什么事就写，所以拉拉杂杂，之所以将想到的都告诉您，是因为我信任您，您是一个有亲切感的英雄。我相信，喜欢孩子并愿意与之交流的大人，是真正聪明的人，希望您也是这样的人。信就只写这么多，算是表示我对您的尊敬。

子尤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日于北京大学校医院

重新理解 50-60 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与左翼”

李娜

一、作为启蒙的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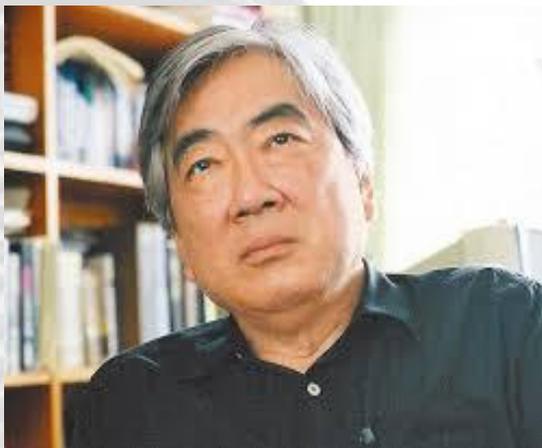
陈映真早期创作中，受到最多关注的无疑是《我的弟弟康雄》。康雄这个“少年虚无者”，铭刻了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台湾知识青年一种挣扎于困顿中的精神状态。陈映真自认此一时期的作品是“忧悒、哀伤、苍白而苦闷” [2]，而与他一同度过这段“惨绿”时期的小伙伴尉天骢说，当是时，“陈映真的虚无是一种启蒙”。

[3]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作品虽然弥漫乌托邦的梦想，但退化自于安那其的理想主义，却也可以使他们在迷茫中感受到一股新锐的力量；特别对于上世纪五〇、六〇年代之交的那些仍然困守在颓废中，自我感伤、相濡以沫、互相取暖的一群来说，也在无形中之开启了更大的思考、追寻的空间。[4]

善哉斯言。从那之后，心有不甘探寻出路的青年，对康雄的钟情，尽管总不免投射着一种小布尔乔亚的顾影自怜，却不能不说，这个并不丰满的康雄形象，打开了一个为 1950 年代白色恐怖所截断的、青年反叛者的精神谱系

但陈映真早期作品的影响力，主要是在台北小小的文艺圈子，特别是醉心于“现代文学”的探索的文艺青年中；康雄和《故乡》《家》《苹果树》中这一系列“稚气的背德者” / “少年虚无



陈映真
(1937-2016)

者”，也很快随着陈映真读书、思想的成长和虽则“幼稚”到底迈出去的“行动”，而淡化至于扬弃了。[5]将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青年的“虚无”更明确地对应于个体经验和社会现实，并在更普遍范围的青年中“风靡”的，是王尚义。1963 年 8 月，26 岁的王尚义因肝癌死在他读了七年、刚刚毕业的台大医学院，家人和朋友

们从他生前留下的文字中选编了《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由文星书店出版。这本包括了存在主义哲学、现代文学论述和少量创作的小书——包括他过世前几个月发表的《野鸽子的黄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版再版，据说达“100版”[6]。他的文字最初引发青年的共鸣，当是在他的创作和对存在主义、西方现代文学的论述中，如此深切而灵气地织入了台湾青年的现实感受；同时，也是他短暂而困顿的生命中，追寻知识、爱和意义的执着，所以有“这一代的勇士”之称。与陈映真一生丰厚复杂的创作和实践及其在两岸社会政治起伏中的位置，而获得迄今仍不断深入也充满争议的研究不同，生命停格在26岁的王尚义和他80万言的文字，被系上“失落的一代、苦闷、虚无”的标签广为流传，也随着这些词语的脱历史化，为之所拘囿。[7]虽然王尚义至今常常在知名人物的回忆中出现，但关于他的学理论说，却基本是匮乏的。[8]或可以说，王尚义其人其作，是（不只）一代人戚戚于心、与战后台湾历史的展开有很深关系、而实际并未阐明的生命印记。

王尚义生于1936年的河南汜水，比陈映真大一岁。两人虽有共同的朋友，却似乎并无接触。[9]或许，1950年代末已怀揣朦胧的左翼情感的陈映真，对王尚义、李敖等为《文星》杂志——这一试图延续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脉络的杂志——所延揽和看重的“台大才子”们，并无结交的意愿。

不过，为了进入那段历史中的一些重要层面，需要搁置左右或自由主义的划界，才能与当日青年摸索、流动、发展、碰撞中的思想和由此激发的波动不安的情感，贴身而行。1960年代之交，无论是对陈映真和他以“中国的、现代的、青年的”为口号、建设“自由中国的现代文艺”的《笔汇》的朋友们，还是王尚义和那些知识探索的幅度广而杂、“对一切抱定怀疑的态度……相信自己跑在时代的前端”的“台大才子”们[10]，左右、“主义”尚未成形，不构成分界。

1950-60年代的台湾，一方面是对左翼的大肃清和无所不在的情治机关、校园管控带来的低气压社会氛围；一方面，是在土地改革、美援下逐渐走上轨道的经济发展，似乎终于迎来了战争过后“松



《教育与脸谱》

散的平静”。[11]对上一代人来说，即便是抱着流亡、暂居心态的，也可以喘口气了；而对青年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敏感于时代创痛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压抑和文化上的保守、欺瞒与自欺（譬如，将三民主义教条化，“包山包海”从而形同虚设，对1930年代现代文学传播的禁止，对国共斗争史的掩饰和避讳等），是难以忍受的。

在这样矛盾、晦涩的时代中，“文学和艺术”成了青年寻找思想出路“孤寂中的光亮”。校园内外办起了各种文艺同仁杂志，当时“单薄”、却终在文学、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的，如《文学杂志》《文星》《笔汇》《现代文学》等，纷纷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出炉。在1930年代文学和苏俄文学都逐渐被禁的情况下，西方现代文学、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艺术成了青年重要的资源

——既是战后台湾生存状态的镜像，又得以寄托对官方主导的“反共八股”和“怀乡文学”的不满和反动。这一代青年中的许多人，或随父辈或只身经历了战乱和流亡，或经历了从日本殖民到光复初期家国意识的大变动、民主思潮的一度活跃（1945-49）和冷战之下的大肃清，被时代逼着早慧的他们开始提笔写作时，不管稚拙或粗糙，已然是有着历史风尘和沧桑感的青春文学，自然而然地用了时而热情，时而忧郁，更多疏离、否定和迷惘的笔法，来表达他们对压抑时代的感受或生存意义的追索。20多岁的陈映真和王尚义，是其中特别有天分、特别敏感，阅读与思考都超乎寻常的两个。

正是从“虚无”，从青年对现实的疏离、否定，以及如何疏离的角度，将《我的弟弟康雄》与《野鸽子的黄昏》放在一起，进行历史化的细读，会发现它们有着如此意味深长的互文相关性：这是一个探索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台湾青年的“虚无”的历史构造，重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之间的张力的契机。

在“虚无”的外壳中，包裹着什么样的青年对社会现实和时代困境的认知？对特定时代特别容易被感染的人，“虚无”从何而来？

将“虚无”赋形的文学写作中，透露了怎样困顿而执着的探索：“虚无”往何处去？

二、辽远而切近的虚无

《我的弟弟康雄》以康雄姊姊的口吻叙述：“我”的弟弟康雄，曾经以“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构筑了他的乌托邦的“少年虚无者”，在他寄居的小镇上的教会圣堂中，仰药自杀了；屈辱地埋葬了弟弟的四个月后，“我”按照父亲的期待嫁到一个富足人家。“我”读完了康雄的日记，自觉了解了弟弟的秘密：这个安那其的信奉者，死于“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我”决定为康雄修建一座豪华的墓园，之后，将安心享受为丈夫所爱抚的膏粱的生活。

康雄出场就是一个以自己的日记宣称了的“少年虚无者”。对康雄来说，虚无首先是个激进的“追求”。尚未经过戮力实践的人生，虚无源自对现实的不满和意义的追索。小说通过康雄姊姊所阅读的日记片段，透露了康雄虚无/反叛的若干指向。首先是对宗教的否定：“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

的律”；还有对婚姻的否定：“虽然我是个虚无者，我定要看你（姊姊）的婚礼，因为我爱着你……”；也包含对社会经济现状的批评——“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 [12]

这些“虚无”的表征，隐隐然与台湾的社会历史有关，又可以脱离台湾具体时空的脉络得到认识——康雄显然有着某个辽远的身世。

康雄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死于“上世纪的虚无者的狂想和嗜死” [13]。这透露了康雄的身世，他确乎来自“上个世纪”：在创造了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这一指称和形象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阿尔卡狄不无骄傲地宣称，他的朋友和导师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个让



《我的弟弟康雄》

他贵族自由主义的父辈闻所未闻、大吃一惊的词，指称的是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前后主张民主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虚无”意味着他

“是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14]少年康雄在批评和不服从之外，初建了他的社会意识：“有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的乌托邦”；然而他毕竟是个稚气的、没有出路、无法坚决，甚至也无法大声宣布他的虚无是一种“主义”的虚无者。

尉天骢以青少年时期与陈映真同游共读的亲密关系，见证、强调了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到旧俄文学对陈映真早期创作的影响，并提出，这种“承袭五四遗风”，对外来的乌托邦思想的关注，是那时代有着理想主义倾向的青年的共同经验。在旧书摊发现一本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仅凭这样书名便够他们侧目。

旧俄的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作家所信奉的：关怀贫穷、反对不公、抗拒专制、鄙视奢华、追求简朴的生活法则，也便混合、传承下来成为知识界的美学。他们可以称为左派，但与政党并无关系。上个

世纪的五十年代后期，这样的思潮逐渐在台湾散发开来，绝非空穴来风。陈映真作品的出现，正代表这一发展的趋势。[15]

将 1950 年代后期知识青年这样一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想象，视为“知识界的美学”，大约既点出了某种历史事实，也轻忽了其内在蕴含的力道。陈映真之成为“左派”，便包含了从此开启的对历史和现实的追索。陈映真自我回顾，在高中阶段读了许多旧俄小说“似懂非懂”，却让他对初中时在父亲书房不告而取的《呐喊》，有了“较深的吟味”[16]；1958 年上大学之后，在牯岭街读到 1930 年代左翼文学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社科书籍，唤起了对遍地红旗的新中国的向往——这些知识和思考上的累积、冲击，让幼时邻家大姐姐的被捕、车站前枪毙匪谍的布告，得到了历史性、结构性的理解。

在《我的弟弟康雄》中，可以看到陈映真既同情康雄，也需要告别“康雄”。借用康雄姊姊——这个曾经被康雄那些“讲着奇怪但有趣的话”的留着长发的朋友们所吸引，并且爱上一个小画家，却在埋葬了康雄之后即被世俗的富裕安稳“招安”了的“简单的女

子”，[17]透露了被康雄和他的朋友们寄托“乌托邦”的“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对康雄姊姊这样的青年的影响，实则是异常薄弱的。康雄有限的实践（打工以及搬到劳工中居住），包含着旧俄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和“走向民间”，在台湾的处境就如同康雄的细瘦苍白、眉目清秀，有着没能发育的“一身未熟的肌肉”。

陈映真之所以没有停留于“美学”意义上的反叛，之后走向更落实的左翼立场，从《我的弟弟康雄》可以看到某种必然性。但那来自旧俄变革时期的文学，眷恋高贵的自由、美与艺术，也同情、向往着（将燃及自身的）民主革命，有着动人的自省的人道主义——实则不只为陈映真早期作品打下烙印，且很深地留在了他身上。旧俄文学对台湾青年的影响，不只发生于1950-60年代，而是更为深远持久的；但或是因为1960年代之交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很快涌入，潮涨潮落之间，没有得到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更多重视。

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乍看就是存在主义的风潮之作。小说以“我”的回忆展开：“那年春天”，大二学生的“我”，因胃病被“姑母”怜恤，到她乡间的别墅休养。却因与大表妹的恋情，惹

恼了视大表妹为掌上明珠、以“外交官”期待其前程的姑母一家。姑母身为教堂执事，以办育幼院知名；教堂的牧师便前来劝诫“我”，而“我”在他的滔滔大论中，听到了牧羊人出卖羊群的谎言和新兴法利赛人的傲慢。其后，表妹出国，带回一个“博士”。教堂的婚礼上，“我”退到远远的人潮之后，“看表妹被人拥上车，看一缕浓烟在街尾消失”。

与《我的弟弟康雄
依托姊姊的告白/忏悔、
强烈指向青年的内在
主体状态不同，《野鸽
子的黄昏》透过“我”



王尚勤、王尚义兄妹

的回忆，在“脱俗”的自然风景与恋情描写之外，更突出对现实的荒谬的指认。沉默以对牧师，而内心翻滚着对每一句训诫的轻蔑和驳斥的“我”，颇有加缪《异乡人》中默尔索的气质，“我对沉默有一种固执，我不愿辩白，与愚昧相较有何意义？”“我对自己甚感满足，我的存在即使嵌于绝望的边缘，它赐我自由与勇敢，不像

他们，他们需要上帝，因为他们有罪，他们不但空虚，而且恐惧。”作为主体之自由被确认的“沉默”，经由“回忆”发为对现实的批判。“我”遥遥望向表妹婚礼的目光里，远不只是一段失落的恋情，是看似温情的生活中贫与富的分界，是慈善的可疑，是投机的洋化牧师，是以美国为指标的台湾青年的未来。“我”说：“这真是一个兴隆的时代”。[18]

所以，似乎存在着一个与《我的弟弟康雄》相似的“主体与文本”的关系：在具有“存在主义”风格的书写中，包含着对“存在主义”之为一种思想途径的限度的突破。

将《野鸽子的黄昏》同王尚义有关存在主义、现代文学和“失落的一代”的文章放在一起看，或可以把握王尚义的思考动力、资源与脉络。第一，他对存在主义特别下工夫，有意做有体系的梳理——从哲学到文学，从早期源头、发展到法国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特殊形态，把存在主义看作对经院哲学的反叛，且特别关注它在“反叛”之路上能走多远。这个远，包含了意义和价值重建的期待，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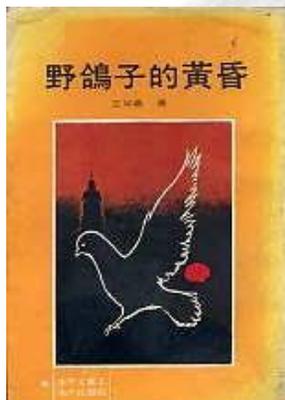
含了从个体情感、良知的肯定到社会意识的打开。重重追索之中，他对存在主义是有保留的。

我认为存在主义把现代人的感受化为一种语言问题，它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自觉性的意识不能摄归于认知的活动，所谓的自由和责任都会落空。

……在一个理性系统悲剧的爆裂中，人如何能在其间继续生活？……我想存在主义者没法给我们回答，它只给我们部分混乱的提示，或者说，只是喊醒我们从绝望的另一端重新开始生命，至于我们所不断要求的那个生存的理由，却必须从我们所窥见的真相中去谋求出路，这就是存在主义给我们的启示。[19]

王尚义认为存在主义的意义在于“喊醒”在苦闷中彷徨的人，然而弃置理性使之无力提供出路。从这些在1960年代的台湾发表的文字中，隐约可辨，王尚义对存在主义的阅读，或包含了萨特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互动。他提出存在主义把“现代人的感受”（对应着社会问题）“语言化”，从而可能回避了对现实的真正“认知”；这使得萨特所高喊的“自由和责任”无从落实，“我们所不

断要求的那个生存理由”（即现实变革），必须来自更切实的现实认知。王尚义对存在主义“将现代人的感受化为语言问题”的批评是尖锐的，预见存在主义在第三世界地区知识分子中，将因此而



以空洞化、美学化的方式“大大流行起来”的命运。这一时期王尚义写了一篇《存在主义与恋爱》的小说，1967年陈映真则写了著名的《唐倩的喜剧》，同样以讽刺手法描画了这样的第三世界“存在主义知识分子”。虽则，后者是更成熟的力作，但王尚义的早慧敏锐仍令人感叹。

第二，他对美国“失落的一代”的文学的介绍，特别是对海明威的多次剖析，一方面肯定海明威以艺术的真实再现了普遍事物的真实，用“疯狂、逃避、肉欲和酒杯”忠实传达了一战后人的理性和信仰的崩塌；一方面，认为海明威停留于此，“关闭在创伤的小天地里”，拒绝对战争的原因做探讨。因此，海明威虽也可以说是

个“人道主义者”，但其人道是“畸形”的。海明威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王尚义的目光已转向：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写作而于四十年代成名的几位美国作家像史坦贝克、福克纳、伐莱尔、撒洛扬已认真地去理解社会、集中力量挖掘社会的病根，并开始探索新的信仰了……我热切地盼望我们这一群在“异乡人”和“失落的一代”的绝境意识中徘徊的人，能从此建立我们的希望和信心。[20]

王尚义与台大文学系的好友杨耐冬共享着这一在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探索。1963年，杨耐冬翻译了史坦贝克的小说《大地的象征》，“野鸽子的黄昏”便由此而来：

一个阴雨的黄昏，王尚义拖着他那疲乏的身子，带着他那“异乡人”的笑声来找我。当他的笑声一停下，第一句话就是，“老杨，史坦贝克为我解答了失落之谜，哈哈哈哈哈，斯芬格斯要跳崖了。”说着他把我的翻译手稿递给我。里面还夹着他的一篇《野鸽子的黄昏》。他又说，“这是我看完《大地的象征》后写的，你读读看。”[21]

杨耐冬翻译为《大地的象征》（1933）的小说是史坦贝克的早期作品：带领一家人到西部拓垦养牛的农民约瑟夫，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生命力，对人对土地对自然怀抱热烈而温柔的情感；他不拘泥于新教、天主教，以一棵树寄托父亲的灵魂，甚而将印第安人视为圣地的“林中旷地”作为精神家园，于是，他同时被信奉新教的大哥和镇上的神父视为异教徒。异教徒约瑟夫，被譬喻为旷野中的野鸽子。王尚义将《大地的象征》中反复出现的黄昏时所有动物都静立、野鸽子也要寻求静水池的意象，化用在《野鸽子的黄昏》中：牧师为“我”祷告：“主啊，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没有家，野鸽子在黄昏的时候也要依傍溪水，他却漂流在旷野里……”牧师指责“我”不信主、“缺乏爱”，而“我”内心的回应是：

……许多年来，我背负了太多感情的债，我爱国、爱家、爱每一个人，爱使我的流浪获得力量，那么我缺少的是哪一种？……活

在爱中的，必能牺牲，像他那样的享受吗？像他甚至谈到爱的时候也只是作为一种借口吗？我不愿回答，我知道出卖耶稣的正是他。

[22]

“一个流浪的青少年”是王尚义作品中恒在但又潜藏的主体，同这代在大陆经历过战争和流亡的年轻作家一样，他很少直接写流亡，总是以回忆故乡风土与流亡之地的人与景来寄寓爱——这种爱隐含着家国之痛，隐含着铁幕低垂之下异端青年的身心挣扎。相较之下，牧师讲的爱何其空洞和虚假！“我”需要一种新的形式的爱，对历史有承担，对现实有力量的爱，才能支撑此间生存的意义感，也即那“不断要求的生存的理由”。这样的爱从何而来？迅速发展的基督教会固然没有提供，正在风靡起来的象征知识界方案的存在主义也不够。

那么史坦贝克何以为王尚义解决了这一“失落之谜”？异教徒约瑟夫被视为野鸽子，却拥有更真挚的对于大地与爱的信仰。在迁徙之地拥有了农场和牛群的约瑟夫，看待一般被当做佣工仆役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只有“人”的标准：在大地的恩赐和灾难之前，人们是平等的，人们只在爱、勇气和担当中结为兄弟。这也是约瑟夫不执着于某种选民的宗教的原因。爱是献身，最终他将自己献上圣石祭坛，以自己的血换来干旱大地渴盼的甘霖——史坦贝克早期

作品的浪漫，来自根基于土地、斗争的，包含了素朴的民主意识的人道主义，应当正是这点，击中了王尚义和他的朋友。

在《野鸽子的黄昏》之前，王尚义写过两篇有关史坦贝克的文章，一篇整体介绍其创作历程，一篇是对他1961年的新作《令人烦恼的冬天》的读后感。

在美国近代的写实主义作家中，史坦贝克是更接近大众，更富于同情，更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的意味……在《愤怒的葡萄》中，他揭露了繁荣社会下的贫困，他赋予流浪以战歌的意义……但在去年他的一本新小说（《令人烦恼的冬天》）里，他说明了他的沉默与他的幻灭，他说他是一个逃避自己时代的人，他有力地指出了在现实的大黑暗中，个人的思想、行为、任何肯定的努力，至终不过是一点孤寂的光亮而已。[23]

王尚义看到了成熟时期史坦贝克对“社会各阶层”的深入；看到了晚近时期史坦贝克于“幻灭”中的坚持；最后，他看到了史坦贝克青年时期的炽热的“浪漫”——《野鸽子的黄昏》是在《大地的象征》启悟下写出的，却可以说拥抱的是一个整体的、有着历史

过程的史坦贝克。以野鸽子为譬喻，否定了宗教的伪“爱”和世俗的“飞黄腾达”的同时，王尚义问出了“那么我缺少的是哪一种(爱)？”1962-63年的王尚义，不但藉由哲学、文学的探索寻求思想出路，也为自己的医学专业设想了有激进意味的道路，比如，像史怀哲一样到非洲行医；而写作，只有走向现实，像约瑟夫一样“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写作，才能使流浪具有“战歌”的意味。



也就是说，《我的弟弟康雄》和《野鸽子的黄昏》这两篇青春文学所透露的作者的主体，都处于一个悬置的、转折的，但尚未能落实的关口。他们看起来甚为“单薄”的书写，却创造了具有高度感染力的形象，一方面，精准地传达了其时青年的苦闷和苦闷中的不甘，一方面，主体的自我反省，指向了一个虽不知从何下手但

《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 很明确的方向——要从个人走向社会。这在《我的弟弟康雄》中虽

正面表达不多，陈映真 1960-62 年间的作品却在日益深入地，以“丰润曲折的笔墨”表现着这一努力及其挫败。而王尚义当此之际是思考集中推进的时期，1962-63 年他在《文星》《大学杂志》（香港）、《青杏》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海明威、加缪、史坦贝克的集束式解读，以及《现代文学与现代人》一文中整合文学、社会和哲学的企图，显示了要在“现代文学的困境”中寻找出路信心。《野鸽子的黄昏》是这一转折在文学写作上的体现，与此前他已刊和未刊的小说散文相比，突出于感情、语言的克制，显示了从个人的浪漫主义到初步的社会批判的展开。然而，就如他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新起点却也是终点一样：刚开始，他的生命却燃尽了。

[24]

以上，讨论两篇作品的“虚无”的辽远资源，指出他们一个使用来自 19 世纪旧俄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一个使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存在主义”、现代文学——其实这是一种不避粗暴的划分，从更多的作品、日记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些外来资源和大陆 1930 年代文学的资源，在他们都是共享的，也是 1960 年代之交的知识青年

共享的——这两种语言看起来颇为不同，却都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整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同时内蕴着各自鲜明的个性，而为青年所呼应；这一疏离中包含的积极否定，又推动着新的道路的探求，此时，“人道主义”成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意味深长、姑且传达还在无名中的思想路向的词，无论如何，需要的是比屠格涅夫、比海明威、比加缪更激进的人道主义。

这就是，何以对其时的青年来说，“虚无是一种启蒙”，而且，这一“启蒙”与导向关注个人意识觉醒的启蒙不同，是导向渴望明确社会意义感的行动的启蒙，推动着青年寻求更硬朗的生活形态。

“少年康雄”和“野鸽子的黄昏”，在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的同时，也在台湾文学与社会的演变中不断被重提、发酵。要理解何以能如此，需要进入“虚无”的在地时空，细究两个“虚无者”的形象，如何既促动又塑造了一代人的知、情、意。

三、此间的“父与子”

一般提及1950-60年代的压抑，多强调白色恐怖和戒严管控，这当然是重要和直接的，但我们看《我的弟弟康雄》和《野鸽子的

黄昏》，会发现，青年的“虚无”和疏离，在生活中，更来自社会的主导观念与青年追寻生存意义感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压力。

在这两部容量不大的小说里，都有一个可以小心拎出来——未必是作者的自觉，也并非刻画、凸显的主线——的结构：长辈与晚辈的冲突。而青年对于政治、宗教、爱欲、友情的探索和矛盾，都可附着其上，交锋其上。

《我的弟弟康雄》中，父亲每次出现，几乎都伴随着“可怜的”这一形容词。

我的突然愿意嫁给我现在的很富足的丈夫，十分使我的可怜的父亲感到惊讶。

我的可怜的父亲，这个独学而并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

这颇给我那在老年丧子的重苦中的可怜父亲一些安慰。他曾努力的劝说我认真地考虑这个丰裕的归宿，因为“人应该尽力的摆脱贫苦这一恶鬼，一如人应努力摆脱罪犯一样”。

至于我的父亲所只能说出的世上最了解的话，只是如此：他说他的孩子死于上世纪的虚无者的狂想和嗜死。

我私下资助着我那可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在一所次等的大学教哲学，一面自修他的神学和古典

[25]

父亲是“可怜的”。请注意他曾“独学”的，是“社会思想”，“转向宗教”的他说



王尚义与家人合照

“人应该尽力的摆脱贫苦这一恶鬼”，康雄却意识到“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战后社会的贫富问题显然对父亲造成了压迫，然而他对既有的社会经济状态，并不能（或放弃？）做出批判性的、有力量的说明。父亲把康雄的自杀，归于某种思潮的、概念的蛊惑，“上世纪的虚无者的狂想和嗜死”，却不知康雄不但在纸上建立了“有贫民医院和学校”的乌托邦，也以在一个在仓库兼职的机会，搬进“劳动者”之间了——他的自杀，虽然未必是康雄姊姊所理解的“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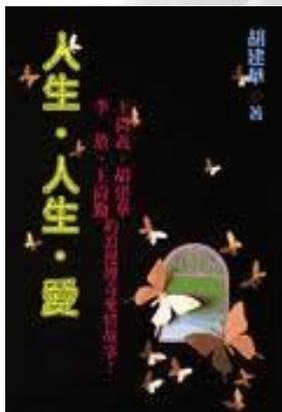
托邦”，却毕竟抓住了核心，也即乌托邦的破灭。而父亲，这教导女儿寻找“丰裕的归宿”、丧失了对“有问题的富裕”的批评的父亲，已经无从理解子辈的理想主义的挣扎。由此，经由女儿的资助，他得以教授的“哲学”、自修的“神学和古典”，即便不是为权力服务的奴仆，大约也只有在归隐中寄情的作用。

《野鸽子的黄昏》中，父辈是“姑母”。“我”的姑母和康雄父亲的身份、处境是悬殊的。康雄父亲是沦落贫苦的知识分子，姑母姑父则代表了大陆来台的上层官员。他们有“乡间的别墅”，“姑母在城里办育幼院，姑父一天到晚忙着开会”。他们对表妹的期待是“环游世界，做外交官”。在“我”和表妹的感情被识破之前，“我”与表妹谈论文学与信仰时流露的“异端”，已经令姑母有“懊恼的神色”了。与表妹恋爱，则是最后的红线。

她怜恤我，是基于自以为慈悲的善意感得到满足，她何尝想过我，又何尝想过表妹？她只是想自己，当她在礼拜堂中站起来祷告时，她很清楚，救济品要到了，她的育幼院又会得到一笔基金；她用教会的资本做慈善生意，净赚的是名望与地位。她懂得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一方面需要面具，一方面需要表演，不然她不会放高利贷，关着门打麻将，在教堂里痛哭流涕。[26]

“我”的姑母和康雄父亲属于不同的等级，都有着或有过某种社会关切，而且姑母有资源，有教会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开展具有公众意涵的事业，比如育幼院。但从“我”这异端的不惮恶意的



眼中观之，姑母做的是上层人特权的慈善，是为了个人的声名。康雄父亲和姑母在子辈眼里，一个是失败了，一个是堕落了。康雄姊姊对父亲带着哀怜；“我”对姑母则是既疏离，又激烈的批判。而这合起来，也就是抱有社会理想的子辈对坍塌了的父辈爱恨交织的情感。

《人生·人生·爱》 子辈在虚无的反叛中，试图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向社会层面扩展，而看似对此负有责任也有意愿或资源的父辈那里，不是转入“神学和古典”中自我安慰，就是将社会工作化为个人光环。父辈的背后，也透露了“党国”的面影：姑母当选为当局表彰的“好人好事”，显示着“党国”社会教化方式之陈腐、无效；而

康雄父亲从“社会思想”转向“神学与古典”，也就和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无关了。

有意思的是，在《野鸽子的黄昏》之前，王尚义写过有关“姑母”的散文《第四个家》，颇为细致地写了姑母如何办育幼院，如何对待贫病的孤儿；如何不顾家人的反对，将自己的房子做了育幼院；又，追溯到抗战时候，姑母就曾办过育幼院了，“把一群流落的孩子们，从战火里带到兰州”。对这样的姑母，“我”是“深深祝福”的。[27]“姑母”的原型来自王尚义父母的旧交，一位国民党将领的夫人，“石姨”。也就是说，对育幼院这样的社会事业，对姑母的人格，他曾是信任、尊敬的。如今他却对同一件事，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描写和评断。[28]

这该如何理解呢？除了无需把现实和作品对号入座外，《野鸽子的黄昏》写失恋自有立意，则对“姑母”的批判是否别有所指？现实中的石姨抚育孤儿的心或许是无私而虔诚的，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教会和上层的慈善事业的批评。问题也不是对教会和慈善的描写是否具有普遍的真实——战后台湾社会基督教、天主教乃至佛教

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台湾社会、文化、精神和情感的影响，极为复杂，不是本文能力所及——这里关心的是，王尚义何以特别批评教会利用/出卖？

“我”对姑母、表妹和牧师的内心回应中铺排着这样的语句：

……正如姑母所梦想的，她（表妹）可以周游世界，出风头，做外交官，光宗耀祖，点缀门楣。

……他靠着教会发了迹，他有了洋房、摩托车……他是洋人眼中的红人，他的教会是摩登仕女的装饰品……

……他藐视我的情感，像藐视贫穷的教友一样，他算什么？

写表妹在教堂中的盛大婚礼，则是：

……像个鸡尾酒会，仕女们的服饰缤纷缭乱，像个赛马场，汽车的尾巴拖长了一条街，像股票交易所，会众们议论纷纷。[29]

如果王尚义只是因恋情受阻而“报复”，则无需如此描写牧师。对“姑母”的批评或有失“尖薄”，但这是批评比较浅的层面，深的在牧师的形象中。上层社会的姑母、通过教会发迹的牧师与教会构成了一个基体，或者一面镜子，折射王尚义对社会主导的价值、

道德和人们在此间可笑复可怜的、失落理想性的状态的观察，包含了一个理想主义青年有关社会公平、经济和民族情感的诸多意见。

在《我的弟弟康雄》中，陈映真对教会也颇有相似的批评。法籍神父拒绝为自杀的康雄举行宗教葬仪，使得弟弟的下葬寂寞而卑屈，“然而这卑屈的感觉却在我的婚礼中得到了补偿。神父和司仪们都穿上了最新的法衣，圣诗班听说是特地选了一童男为我献唱的。”因为“我”和说着“每一个字都熨平了的的上层人的话语”的丈夫，是“注定要坐在最前排的阶级”。[30]

19世纪的虚无主义者和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的反宗教，有着各自的历史情境和社会内容。1950-60年代台湾反叛青年的反宗教，也有着台湾的特定社会内容。在王尚义的诸多作品中，透露了在不同的宗教中寻求一种既有关信仰、身心的安定，又有关社会功能的期求。他曾参加“青年佛教营”，也曾研读《圣经》，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即便《野鸽子的黄昏》对教会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批判，他想说的也是：

……我仍不反对宗教，我反对的是虚伪；我反对打麻将的教执事，反对享用荣华的洋化牧师，反对爱神却不能爱人的表妹……[31]

爱神却不能爱人，爱真理却不能爱人——这是同样缠绕王尚义和陈映真的问题。他们对宗教寄寓某种希望，但现实中存在的是怎么都不理想的宗教。对王尚义来说，牧师和教会以空洞的爱为借口、以等级的爱为形式，实则是“出卖了耶稣”——这是“曾经穿着‘神爱世人’的背心在街头击鼓唱歌”的“我”不能忍受、不惜做极端的批评的原因罢！而对陈映真来说，对宗教的态度可能包含了另一些层面，更为复杂和纠结。从小跟随家庭浸润于基督教，此时又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图景的陈映真，在透过宗教寻求社会改善的力量这一点上，有超过早逝的王尚义的想象和持续的探索。他要求一种更体现耶稣真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这也是他日后几度从教会“出走”又“回归”，并且对“解放神学”特别亲和的原因。

在子辈这一代，可和康雄——“我”相对照的另一组人物是姊姊和表妹。看起来，她们又是很不同的。从比较的“实”的层面看，康

雄姊姊代表了一类告别了似懂非懂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但她毕竟有限地，也或许是自欺地“反叛”过。表妹则不但是一个被父母寄予厚望的资优生，而且是把父母展示给她的前途，当做青年应当追求的、高尚的人生。她是这个时代被期许的、最正常的优秀青年。但她们殊途同归。她们在教堂举行盛大的婚礼，一个是通过嫁给富人而成为“坐在前排的阶级”，一个是一直“坐在前排的阶级”。康雄姊姊带着一定快感的秘密的“反叛”，并没有妨碍她成为布尔乔亚。而并无此一心理转折，虔诚地走向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和理想之路的表妹，同样是布尔乔亚的。

如果从“虚”的或象征的层面看，与其说康雄姊姊代表了一类告别了似懂非懂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不如说，代表了陈映真的一种如影随形或深入骨髓的“自省”。他层层剥开了康雄姊姊精致的自欺，也是对自己和反叛的朋友们严肃的审视——“反叛”确实是可能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耽溺的。他期待的或许是：能看见自己性格的人，就开始具备了控制这一性格的能力。



胡建华

在《野鸽子的黄昏》中，“表妹”之于“我”，也不只是一段失败的恋情。表妹是个书呆子，这点令“我”厌烦，但对“我”的吸引是，她是一个隐藏着“美与丑，爱与尊严，智慧与青春”矛盾的综合体。在约会中，当表妹急着以信仰和爱海

“我”时，“我微微感到不适”，“在这样的夜里，到处可以获得充实，我们应该沉默，应该打碎分划的界线，像星光与河水，竹林与风。”[32]“我”试图让表妹感受“竹林与风”的和谐，忘记世俗（虚伪的）说教，却失败了。“表妹”之于“我”，或许寄托着一个关于自然、情感教育与主体觉悟的理想，也是一个难题：“我”无法与表妹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社会主流意识争夺她，无从唤醒甚或（妄想）打造她的主体；在现实中，王尚义面对在恋爱中沉浮、“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妹妹，也是一再地“开不了口”[33]。

从康雄姊姊和表妹这一组子辈的形象，我们得到的，是更多关于陈映真和王尚义个人内在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对社会理解的复杂性的信息。康雄姊姊和表妹，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中的陈映真和王尚义的一部分，是从他们内在剥离出来的“我”。她们身上有天分，有不被主导的社会价值所珍视和开发的爱的能力，如若社会环境给予特别的支撑，她们本可以成为更可期待的人。

王尚勤回忆，在大学中常和朋友们汲汲于知识、信仰和思想的热烈讨论的王尚义，似乎一度从此前的忧郁、苦闷中走出来，“他甚至开始关心家人了”，有一天半夜骑着自行车从台大到新店的家，把父母弟妹叫起来，大声喊着：“我要成就伟大的事业！我要唤醒中国人的良知！”[34]

王尚义写过多篇小说，假托自己是妹妹/弟弟，用他们的眼光看自己，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家人的爱，以及何以反而疏离。父辈有历史包袱，有在台湾这又一个流亡之地的流亡心态与讲求现实的心态——“现实”是人们回忆战后初期台湾社会主导性的风气，只是外省人的这一“现实”特别强烈地表现为要儿女读大学、学工(医)

科、去美国。而异端青年的心怀，对父辈这一战争创伤心理缺少足够的同情的理解；在冷战下的政治社会结构中，也无从透过对仍在其中的现代中国史的认识、对话乃至辩论，与父辈达致批判的和解。对着父母喊出“我要唤醒中国人的良知”的王尚义，或许正在这一矛盾中激荡。[35]

此间的“父与子”，从有所思的子辈的眼睛看出去，现实中的父辈已经坍塌，精神上的父辈在他们文学、哲学的探索中，既给予营养和资源，也供其省察和批判。陈映真和王尚义在天分之外，有着一一种既深浸于时代的苦闷，又寻求超越的心志。“必须从我们所窥见的真相中寻找出路”，对王尚义来说，是认识现实，唤醒良知；对陈映真来说，是认识现实，改造现实。这就是他们在特定时空中，所以能以虚无、疏离的文学造像打动一代青年，并埋下了起而行之的种子的原因。

四、虚无、现代主义与左翼

陈映真对台湾现代主义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是鲜明的，但也有阶段性的差异。1967年他对“现代主义”发起激烈批评时，认为

自己没有出过“现代主义的疹子”，是“免疫”的。但他批评的其实是现代主义逐渐风行时，许多作品表现出来的追求诡奇晦涩、刻意伦理倒错、脱离现实、不以思想贫乏为意的倾向，如果我们回到深受存在主义哲学、西方现代文学以及旧俄文学影响的台湾现代文学的产生期，特别是，透过《我的弟弟康雄》与《野鸽子的黄昏》这两个被认为具有叛逆/另类气质的青春文本，就可看到，现代主义曾经和一代人的经验、情绪有过一种不同的配合方式：不仅不是“移植”着西方对荒谬和悲怆的表达形式，反而是能够让他们迅速疏离不合理的现实，以探索理想社会和人的出路。战后普遍的迷茫和冷战结构下台湾的诸多禁锢，使得1950-60年代的青年倾向接受包括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外来的语言/书写方式，《我的弟弟康雄》和《野鸽子的黄昏》便是在此中，以高度感染力的文学造像打中青年的心，同时在立意反叛之外，显示了有限地承担责任、向社会意识推动的意图；或者说，其时的陈映真和王尚义，有了某种想象的社会意识，使之和宗教、和国民党当局提供的空洞的价值论述有更深层、更有力的疏离。其影响所及，从较为精英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扩展到了更普遍范围的青年。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应该重视从1960年代青年——这被认为是苦闷而“喑哑”一代的虚无、疏离的特定状态中释放的能量。如果没有经过这一环节，台湾青年或许不会那么快、那么自然地走到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的激进思想探索和“回归现实”的行动风潮中去——包括在岛内和海外都秘密发展起来的“第三波”左派。

有意味的是，1960年代的陈映真和王尚义都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现代主义”的，并分别对台湾的、西方的现代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把陈映真写于1967年的《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和《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与王尚义写于1962年的《现代文学与现代人》《现代文学的困境》《达达主义和失落的一代》等文对照来看，两人论述、批评的对象一为“战后台湾的现代主义”，一为“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之后的）现代文学”，其间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困境的描述、弊端的批评，乃至对于“出路、方向”的吁求，实有着相当的共情。

首先，两人都肯定西方现代主义兴起的意义。陈映真说：“（《等待果陀》）是一出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内容作了十分优越地逼近的少数作品之一”。王尚义则以海明威为例，肯定其“忠实再现现代人的处境”，同时不满于他的“停留于再现”。他对仍在“草创和实验阶段”，但就其“半个世纪文学的趋势”来看，已经在“摸索中走入了困境”的现代文学的特质，如此概括：

……他们远离了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放弃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否定平易的思想和感情，他们追逐的是魔法，是神经的震动，是无可知世界里迷离的呼声。[36]

而陈映真对台湾的现代主义的批评，除了类似写作现象的罗列，还提出了台湾现代主义的“错位性”和“亚流”性格，即台湾并不具备客观基础，“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虚像和实相间的距离”使得“（台湾现代主义）就连现代人的某种疼痛和悲怆的感觉都是那么做作”。也就是说，他认为台湾的现代主义在“对现代人困境的逼近和再现”这一积极意义上都不够格，遑论“先天思考贫弱”对其发展的限制。[37]

强调客观基础和“先天”体质——也就是台湾 1960 年代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造成一代“思考上、知性上的去势者”，这一批评显示了陈映真初步以政治经济的思考解剖现代文学在台湾的特质，同时显示了，他对 1960 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所包含的“压迫境遇中的人”的主体能动性——无论是对他自己的少作，还是对他视之为“流行小说/浪漫主义”的王尚义，或一些军中诗人如商禽、小说家如舒畅等以“荒谬”和“超现实”逼近时代困境的书写——认识和肯定不够。



《狂流》

但在另一个层面，陈映真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并非全然是一种环境决定论，而是随着他的写作和思考、实践的发展，随着朦胧形态的“左翼”的孵化和集结这一历史进程，逐渐激进化的。

1963 年之后陈映真因为和日本外交官的接触，获得了更多中国大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发展推动他走向行动时，不管是对读书会成员还是他们想要接近的“工农”，现代主义文学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了。1965 年陈映真加入《剧场》杂志，和后来曾走向左翼的刘大任、郭松棻一起，“拼命翻译了许多自己也看不懂的西方电影剧本，介绍西方大师”，一度对电影和戏剧这

种更面对大众的艺术形式怀抱希望。同时，美国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中产生的民歌、纪录片等形式传入台湾，也启发了他对于民众的艺术形式的思考。以此再来理解1967年参与组织了贝克特《等待果陀》的演出后，他向“现代主义和现代诗”开炮，提出了台湾现代主义盛行，却“史无前例地从民众中孤立起来，舍弃了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文艺任务”[38]，也就是说，此时陈映真对现代主义的不满，更在于左翼的思想、对象渐渐清晰并走向行动时，要求一种更配合的文学，而现代主义的弱点，其实不只是“横的移植”与否的问题，更不是那些空洞劣质的创作，而是“现代主义”本身存在的过于注重个人主体感觉和状态，与社会实践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实践要求明晰、更有战斗性的文艺表现形式，这也是到了1970年代，当保钓运动打开了更大空间时，现代诗批判和乡土文学论战展开的心理与意识基础。

另一端，王尚义早逝，《野鸽子的黄昏》之后他会走向哪里，似乎不能断言：从他如此关切着“走到社会阶层中”，从他翻译的一部讲群众运动的书《真实信徒》，[39]以及，从他对存在主义的

反省来看，王尚义或许会为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别样的台湾样本；换言之，即使他不会走向陈映真式的左翼，也会是一种指向现实、怀揣种子的人道主义者，或曰，隐性的左翼。二者的互动和转化，正是我们在1970-80年代台湾社会中可以看到的突出的现实。

至此，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成长经验相差很大、看起来属于不同圈子、不同思想脉络的两个人的意识，却有相当的共情和相像？

1963年王尚义过世、朋友们张罗着为他出书时，好友景新汉说，“尚义真实的思想是不可能在台湾出版的。”何为王尚义“真实的思想”？晚年的李敖开口：王尚义“向往的是大陆和社会主义”[40]。他的妹妹王尚勤，则提供了更多切近的生平线索。1949年武汉解放时，读初一的王尚义“是出色的学生，参加了少年团，参加了街头演讲。在整个中国巨大的变动中，他欢呼，他歌唱，随着群众手舞足蹈”；然而父亲是国民党官员，他不得不随家人逃亡到香港，再到台湾。高雄登岸时，因为纪念册上朋友的“赠言”，他被海关和

警总扣留；过世后，朋友们在他的箱子底部发现了一本“自首证”，当是这个经历留下的烙印（以及枷锁？）。初到台湾，王尚义曾在澎湖就读流亡学生学校，经历了“七一三事件”后持续的白色恐怖气氛。[41]

不管王尚义是否在思想、理论上左倾，少年的他见过蓬勃改变中国的状况，又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切身的压抑，这些，当加剧了他对台湾的现实的不认同；以对“左翼中国”的隐秘情感和想象作为触媒，他作品中的苦闷和虚无，和陈映真一样，有了不同的、更具吸引力的气味。从王尚义和陈映真有此共享的“左翼中国”的秘密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他虽然在被《文星》杂志所延揽的“台大才子”群中，但对这些“台大才子”也有选择、有距离、有批判，典型的是他交往颇多却并不“投机”的李敖；而妹妹王尚勤和亲密的朋友景新汉等人，在留美后都曾参加左派的读书会，景新汉更是在1960年代中期回到了大陆，定居山西。

王尚义在思考和创作上都显示了关键的推进/转折的时候，遽然而逝。如其不死，他和陈映真的相通和互补，或许将会为台湾现代

主义与左翼的开展，提供更多创造性的经验。从他们的“少作”出发，重新体察现代主义和左翼，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一种强烈的、正面的关联，在于平等、公平、真诚的要求，在于社会意识的取向，看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承认，台湾的现代主义作为一个“非政治”的批判手段，曾经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现代主义”是1960年代青年的苦闷、混乱、愤怒的状态的承载，也是摸索思想出路的资源，是一个打破再造的基点。如此，也就能理解，1970年代岛内外和世界形势打开了空间时，起来的行动者为什么正是脱胎换骨的当年的现代主义青年。其时，他们掀起了以现代诗批判为开端、以乡土文学论战为高潮的“回归现实”的文化运动。借着批判现代主义的脱离社会现实，精英的、个人的倾向，提出了对战后台湾的新殖民处境的体察和认知，提出了文学、知识和思想对时代的承担。尽管这些以现代主义为靶子的批判，对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整体状况，是不尽相符的。同时，随着在此一论战中逐渐集结的左倾知识分子走向运动的需求，“现代主义”似乎就此和左翼“势不两立”起来。而拉开大的时空来看，现代主义与左翼不但在1960年代的萌生期相

互拉扯，在“反叛”的精神和指向上，“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论战中提出的“现实主义”也是连续的、相通的；此前现代主义的摸索经验，实则都已经是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学形态的资源——台湾左翼在“现代主义”这一脉络上，其实并没有停止。

在当下，追求现实性和斗争性的文学似乎更趋于边缘，但并不意味着新一代青年对文学的社会性没有要求。要探寻更贴合时代的、更能感染青年的文学形式，或许是时候，打破诸如“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类因特定历史条件和运动需求而形成的壁垒，重新反思、启动战后台湾文学的经验和各种“另类”资源了。

从1960年代的《笔汇》《文星》《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到1970-80年代的《文季》《夏潮》《人间》等，这些杂志及其介入、组织的文学、文化运动，呈现了1960年代台湾青年的探索的连续性，在较为宽泛的思想光谱中，知识分子从不同脉络逐渐走入或连接到民间，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兴起时，有力支援、介入了民间社会的力量的成长，也对1970-80年代的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此为后话。本文特别整理分析王尚义作品的风靡和限度，以及1960

年代台湾青年的社会意识的起源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陈映真和他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而不限定从左翼的立场出发，或许更有利于探明其复杂的生成过程。进而，如何把这些宝贵的经验知识化、理论化，使其可以传承，这是本文出发的意识，也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路程。

注释

[1] 本文的写作，要特别感谢在台湾的杨红英、彭明伟等师友帮忙查找、扫描 1960-70 年代台湾期刊和王尚义相关资料；感谢黎湘萍、莫艾、刘卓、贺照田、何吉贤、林丽云、延光锡等师友在日常工作和“转折的年代：40、50 年代的汉语文学”会议中坦率而富有启发的讨论和意见。

[2] 陈映真：《试论陈映真》，薛毅编：《陈映真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 页。

[3] 尉天骢：《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尉天骢对谈刘大任》，《回首我们的时代》，台北：印刻出版社，2011 年，第 426 页。

[4]尉天驄：《理想主義者的蘋果樹：瑣記陳映真》，《回首我們的時代》，第 228 頁。

[5]1964 年陳映真和一些朋友結成讀左派書籍的讀書會，“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1968 年以“台灣民主同盟案”入獄。見《後街》，《陳映真文選》，第 22 頁。

[6]1964 年文星書店出版《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在青年中風靡至 1970-80 年代不衰；自由太平洋、水牛、大林等出版社陸續整理、出版了他的遺作，包括小說、散文、詩歌、論文、日記、情書、譯作，舉凡 80 萬言。先後出版的有《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狂流》《野鴿子的黃昏》《深谷足音》《荒野流泉》《野百合花》《落霞與孤鶩》《真實信徒》。2015 年，大陸的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也引進、出版了三本王尚義作品選。

[7]1995 年水牛出版社又出版了兩本有關王尚義的書。一本是《野鴿子的黃昏》中“表妹”的原型胡建華的《常春藤的哲人》，一本是王尚義的妹妹王尚勤的《王尚義和他所處的時代》。前一本的出

版说明中写到：“1973年夏天，有一位女学生自杀身亡，身旁放一本《野鸽子的黄昏》；1994年，两位北一女资优生同赴礁溪，在旅社中双双自杀，据报载：两位学生平日喜读尼采、叔本华和王尚义的作品。《野鸽子的黄昏》再度受到瞩目，甚至有人打电话到本社，希望本社不要再出版这类书籍。”胡建华自言要写出王尚义实则“明朗”的个性，以纠正其作品被列为“青少年不宜”的“灰色”书籍的印象。

[8]研究方面，大陆有朱立立提出“王尚义是被文学史低估了的作家”，主要放在存在主义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脉络中肯定其价值和浪漫主义特征。朱立立：《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台湾有“清华大学”台文所邱郁伦硕士论文《王尚义与台湾六〇年代存在主义思潮》（2010年）。

[9]1968年初陈映真曾在淡江文理学院做一演讲：以王尚义作品为流行小说分析其“浪漫主义”特征和不足，并未涉及其文学和哲学讨论中显然超出“浪漫主义”的思考。见《当前流行小说中的浪漫

主义：王尚义作品评论》，《青年战士报》第6期，1968年1月25日。

[10]在王尚义完稿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狂流》中，以自己的朋友为主角，写T大这一批才子型的青年在恋爱与知识追求中的矛盾和幻灭。“当时，在T大有一批‘才子型’的青年，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有很大的狂热，对人生和事业有卓绝的看法。他们有远大的抱负，高超的理想，有奋斗和改革的勇气。但这一切常跌碎在客观环境里；梦想不能实现，造成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不甘于寂寞，只有妄想和空谈，谈生命和事业的创造，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在他们的思想里，否定和批判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而对一切抱定怀疑的态度……”《狂流》，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11]尉天骢：《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琐记陈映真》，《回首我们的时代》，第222页。

[12]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选1》，台北：人间出版社，1994年，第15、17、11页。

[13]同上，第15页。

[14]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7、228页。

[15]尉天骢：《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琐记陈映真》，《回首我们的时代》，第227页。

[16]陈映真：《后街》，《陈映真文选》，第19、20页。

[17]“招安”一词借用自赵刚《颀颀于星空与大地之间》，赵文对陈映真早期作品有非常精彩的分析。赵刚：《求索》，台北：联经出版，2011年，第51、55页。

[18]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青杏》16期，1963年6月，第69、70页。

[19]王尚义：《现代文学与现代人》（1962年11月9日在台大哲学会上的专题演讲稿，原载《文学》第62期，1962年12月），《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年，第71、73页。

[20]王尚义：《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第116页。

[21]杨耐冬：《译〈大地的象征〉前后》，史坦贝克著、杨耐冬译：《大地的象征》，台北：水牛出版社，1968年，第4页。《大地的象征》（1933）英文名 TheGreenLady，又名 ToAGodUnknown，大陆版译为《献给一位未知的神》。

[22]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青杏》16期，第69页。

[23]王尚义《孤寂的光亮》（原载《文星》54期，1962年4月1日），《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第27、39、40页。

[24]王尚义对“蜡烛两头烧”的命运早有预感，他的日记和散文大致记载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医学院的课业繁重而令人厌倦，平常要为生活费用做两份兼职，夜晚则不能自己地要在文学、哲学的探索和写作中燃烧。

[25]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选1》，第12、13、15、17页。

[26]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青杏》16期，第69页。

[27]王尚义：《第四个家》，《空谷足音》，台北：水牛出版社，1978年，第56、57页。

[28] “石姨”的女儿胡建华提及当年读到《野鸽子的黄昏》后很失望，认为这是尚义（恋爱失败）的报复之作，并且说，她母亲的信仰的境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胡建华以自己的“简介”，为母亲正名。“胡建华，1940年生，浙江人。因其父胡维藩将军驻守在西北甘肃，所以诞生在抗战时期的内都——兰州。母亲胡石清女士则利用龙王庙收容战地孤儿，此为西北育幼院的开始；来台后，石女士一秉初衷创办义光育幼院，即是为人所推崇、众所皆知的‘石奶奶’。”《常春藤上的哲人》，台北：水牛出版社，1995年。

[29]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青杏》16期，第69、70页。

[30]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选1》，第17页。

[31]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青杏》16期，第69页。

[32]同上，第68页。

[33]王尚义在《幻》和《野百合花》两篇散文中，写到他反对妹妹尚勤和李敖交往，甚至跑到宿舍去监督尚勤，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尚勤所以为的，或者他能说出口的部分：才子李敖不懂得责任。说不出口的，除了不认同李敖标举的自由主义，也包含这样的认识：李

教的狂放之所以吸引尚勤，是因为尚勤还没有“找到自己需要什么”，只能随着感情浮沉。但这句话总也“说不出口”，因为“需要什么？走到哪里去？”此时的台湾产生不了解放的女性。借用康雄姊姊的话，康雄自杀了，贫困的小画家自顾不暇，让她“一个简单的女子，究欲何为呢？”参见王尚勤：《王尚义和他所处的时代》，台北：水牛出版，1995年，第32页。

[34]王尚勤：《王尚义和他所处的时代》，第32页。

[35]王尚义的父亲王光临，河南汜水人，1930-40年代曾为国民党的地方专员、县长。1950年赴台。

[36]王尚义：《现代文学的困境》，《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第77、78页。

[37]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文选》，第81页。

[38]同上，第78页。

[39]E·荷华著，王尚义译述：《真实信徒》，台北：水牛出版社，1985年。

[40]李敖：《大江大海骗了你》第131章，李敖出版社，2011年。

[41]1949年发生在澎湖的整肃山东流亡师生的“七一三事件”。参见徐文堂编：《澎湖烟台联中冤狱案口述历史》，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出版，2012年。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



二十七年前的往事

田英奇

整理照片，意外发现一张上次回台顺手拍的「文物」，那是 1997 年八月底，我参加李敖「义助慰安妇」的义卖会，所拿到的目录单。由于我的位子和李敖很近，顺便就请李敖签名。我告诉他，我二十年前就读你的书了（1997 年的时候我 32 岁），他很客气，一直说谢谢。

我的旁边坐着一位女士，她同我说她是李敖的同班同学，姓孙（真遗憾大名我忘记了），在金华女中教书。孙老师有点胆小，说不晓得要不要邀请函，她是混进来的，还傍着我说：要别人问我就说我跟你进来的好了，搞得我有点好笑。有这样的邻座，我当然忍不住问问孙老师李敖在台大历史系的故事，她说同学很少看到李敖，因为他都在图书馆。我问她李敖回忆录里的女友「罗」，她马上说叫罗蕙芳，还说李敖没追上她，是因为李敖不会跳舞。

义卖会的主持人是马英九和蔡琴，当时马正辞官在野，身着礼服，玉树临风，蔡琴还开玩笑说很多人士冲着小马哥这一身穿着而来的。这一次义卖的理由，为的是日本政府对二战时期的台籍慰安妇不闻不问，只肯透过民间团体给每位新台币五十万的补偿，为了避免这些可怜的老阿嬷陷入「道德困境」，李敖决定把自己收藏的古物拿出来义卖，希望募得四千万，给这些老阿嬷每人五十万，不要拿日本人的钱。在之前的电视节目里，李敖点名连方瑀参加，而当天民进党的主席许信良也到场了，算是另类的「朝野和解」。

我去参加这一场义卖会，倒不纯粹是看热闹，我是真心想买一幅陈少白的条幅「莫道山中无人笑，不是真情懒放怀」，我很喜



主持人蔡琴、马英九

欢这种真性情，字也写得潇洒。义卖会进行时，我一直很注意，到了这个品项时，我刚把手上的牌子举起来，就看到中国电视公司董

事长郑淑敏站起来，出价一百万，并将此条幅捐给国父纪念馆。全场热烈鼓掌，我只能讪讪的把手放下了。

买不到我想要的，那就只能精神上「共襄盛举」了。到了一幅「戊戌六君子殉难图」时，主持人蔡琴希望许信良买下来，一直催促「祖席，祖席……。」后来果然成功。会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件台湾番人与汉人订的地契，因番人不懂汉文，因此以手印（七个）为誓。当时的省长宋楚瑜要买下来放在省文献会，但是预算不够，后来有「无名氏」捐了一笔钱补足款项才义卖成功。事后李敖在节目上说，捐钱的人就是与李敖一起协助拯救慰安妇的王清峰。

这些都是二十七年前的事，当时我的记忆力很好，所以许多细节都记得，然而为了补强细节，我上网 google 了一下，居然在当年的视频上，看到二十七年前的自己！李敖左侧，在肩膀位置正在拍手的



本文作者和李敖

就是三十二岁的我。

李敖一生充满争议，喜欢或崇拜他的人很多，讨厌或恨他的人大概更多（李敖名言：你讨厌李敖吗？那你得去排队！），然而这一件「义举」，足以让所有讨厌他批评他的人汗颜。当时李艳秋在广播里访问李敖，李敖说本来他死后要成立纪念馆，现在东西都捐光了，没办法弄纪念馆了。李艳秋对李敖此举赞叹不已，并说，虽然从此世间没有了李敖纪念馆，但是李敖已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建立了纪念馆。

如今李敖墓木已拱，名声消失之快，令人咋舌，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李敖当年的侠骨柔情？爰作此文，以志那个还有一丝浪漫的时代。

刘绍铭、萧孟能、许倬云信札三通

May

以下介绍我所收藏的3通名人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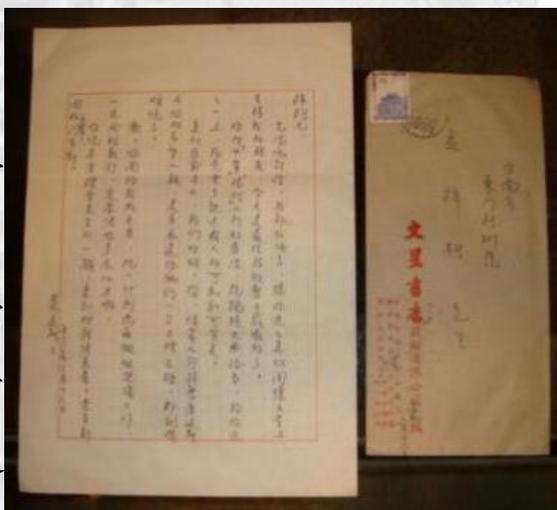
一、《刘绍铭致孟祥柯》信札

祥柯

怎忍称兄「绝子」？

你的信是我两三年来收过的最「怪」的信，兄行状无改，由此可证。

钱大头【注】由图书馆失书而轰走你，你尚有怒言乎？惜你老兄当年把书「送的人都是不爱书的人。



萧孟能信札

我回港两年半，静极思动明年也许会离此他往——到哪里去尚未决定，过了旧历年也许有转机也。

明年淡江开比较文学会议，元叔兄邀了我参加，到时我们谋一面如何？

绍铭 29/12 (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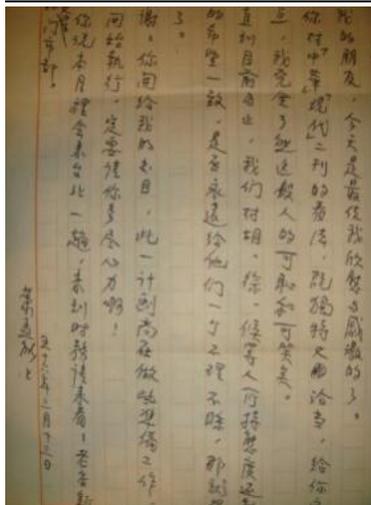
【注】钱大头乃前台大校长钱思亮。



刘绍铭信札

二、《萧孟能致孟祥柯》信札

祥柯兄



先后两封信我都收读了，像你这么真切关怀文星与支持我的朋友，今天是最使我欣慰与感激的了。

你对「中华」「现代」二刊的看法，既独特又恰当，给你这么一点，我完全了然这般人的可耻和可笑矣。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胡、徐、侯【注】等所持态度还能

萧孟能手迹 与你的希望一致，是否永远给他们一个不理不睬，那就很难说了。

谢谢你开给我的书目，此一计划尚在做些准备工作，一旦开始执行，定要请你多尽心力啊！

你说本月里会来台北一趟，来到时务请来看看老店新开的文星门市部。

萧孟能上五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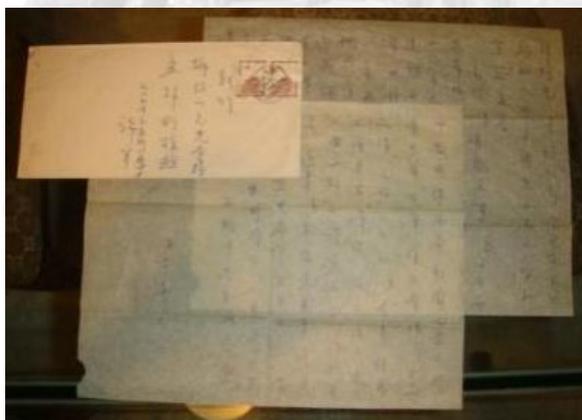
【注】胡、徐、侯立朝指的是徐复观胡秋原等

三、《许倬云志孟祥柯》信札

祥柯兄

来信收到，今天有正义感的人不多，老兄之为人，实如空谷足音。

关于弟未签名事，弟以为无甚奇怪，也无甚值得别人注意者，一向为人之原则是行其心之所安，既不怕人指责，也不在乎人称赞，此种脾气出自祖传改不了也。



许倬云信札

系务差安，但自家功课耽搁太多，亟思逐渐免代，庶几还我研究工作，后者到底是本行，丢不得的。李兄【注】事，恐不可能，因彼从未执笔做过

正式象样的学院式研究论文，一切文章均为杂论式，我们无法为其订一专长，更不论执教的科目矣。大学中教书，事体与新闻记者不同，未可用「文笔」作为条件。至于所谓「仇敌」云云，以弟看来，彼我之间未有「笔仗」

有之亦只是他一面之辞的谩骂而已。论起「笔仗」，近来弟与海光先生曾有辩难，在「思与言」五月号上，第二回合则将在七月号上刊佈，盼兄暇中告知读后感。

祝好

弟倬云七-六（1966）

【注】李兄即李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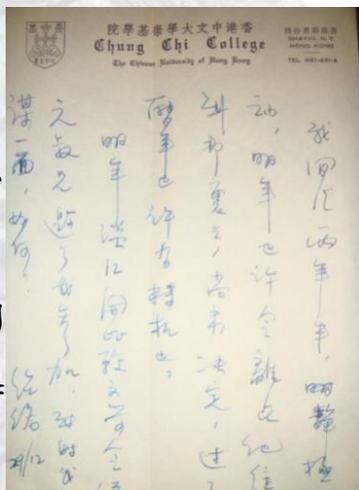
以下资料摘自维基百科：

刘绍铭（1934年7月9日—），广东惠阳人，生于香港，笔名二残、袁无名。

1960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就读大学期间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叶维廉、李欧梵等台大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

1966年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

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与旅美学人夏志清有深交，协助其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并担任部份翻译工作。学贯中



刘绍铭手迹

西，着译颇丰，尤善中西比较文学及翻译学。刊行作品多为散文，行文舒徐，富幽默感。

萧孟能是国民党的太子党，他的父亲萧同兹 1932 年起任中央通讯社社长、人称「萧三爷」。萧孟能育有一对儿女萧广仁、萧近仁。1952 年，萧孟能与妻朱婉坚在台北市衡阳路十五号创设「文星书店」，由叶明勋担任发行人，萧孟能任社长。1957 年 11 月创办「文星杂志」，在创刊号封面特别加注副标「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同时揭示这个杂志宗旨是「不按牌理出牌」。「文星」先后由作家何凡、李敖、胡汝森等人负责编辑工作，「文星」因「叛国控诉事件」与多位文人笔战。1965 年十二月「文星」出版第九十八期后，萧同兹自请文星书店停业。1966 年 12 月 24 日，胡适夫人江冬秀至法院按铃申告萧孟能盗印胡适遗作。1968 年 4 月 1 日，文星书店被勒令停业。结束文星书店后，萧孟能资金周转出现问题，避走海外半年，回国后尝试房地产等事业。作家季季在《文星和明星》一文中提到，当年萧孟能、朱婉坚、李敖三人可称为「文星铁三角」，后来「铁三角却官司相缠，铁窗相见，萧先生后来避走海外」。1987

年，萧孟能离台，赴美定居。2001年7月，萧孟能前往上海。2004年7月23日，萧孟能因心肺衰竭去世于上海。

许倬云（1930年7月10日—），祖籍江苏无锡，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许倬云不仅是中国历史学界的耆宿，也积极介入公共政治生活，他对台湾社会的民主政治转型颇有贡献，曾经大力鼓吹民主化的实现。他将中国历史上的文官制度，以管理学的观念，分析解释，开了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另一途径。

三十岁开启留学生活

李银河

1 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闯天下

1982年我整三十岁。俗话说：三十不学艺。可我偏偏在那一年离开我喜欢的工作、新婚燕尔的丈夫、生我养我的中国，远渡重洋去读书。大洋彼岸那个陌生的国度，在我心中有一点点神秘、一点点新奇、一点点可怕。一切要靠自己硬着头皮去闯。

好在我们这一代人早已习惯了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闯天下的生活。

飞机在旧金山（也许是纽约？我记不清楚了）降落，等候转机。我不知道等候着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倒有点儿像1969年那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卸在荒凉的乌兰布和大沙漠时的感觉。记得北京火车站载满知青的火车刚一启动，火车上哭声一片，我没有哭，心里充满憧憬。我只是感到，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未来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它都将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生命。我希望它是

光明的、快乐的、色彩斑斓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郁闷的、委琐的。

据说美国人均耗费的热能是中国人的 30 倍，换句话说，他们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是我们的 30 倍。但是，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的 30 倍，他们的床也不可能比我们的大 30 倍——人的物质需求相差不大，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李银河

更有意义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虚构之美——音乐、美术、戏剧以至优雅的生活。

深夜的机场有一种轻轻柔柔的背景音乐，这在我前三十年的经历中是从未遇到过的，带点儿异国情调，给刚刚离乡一日的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乡愁。

2 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海外生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我除了初一时学过一年，做工农兵学员时学过一点儿，并未正经学过英语，基本靠自学。所以出国时英语是半生不熟的，听课只能听懂5%，全靠岁数（三十岁啦）、阅历（做编辑记者、做研究的经验）和从“文革”中断学业之后修炼出来的自学能力，硬着头皮读书。

觉得中文把上学说成读书很有道理，学校不一定能教人什么东西，重要的是读书，自己多看书就行了。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共同经历。

如今到美国读研究生，当然会故伎重演，最后得到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也没觉得费什么大劲，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学校教育当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关口，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而已。老



李银河与王小波

师就像猫，设立了一些程序，比如学期论文啊，硕士博士学位啊，作为老鼠，只要不被猫捉到就行了，主要的时间还是自己读书。

说实话，学位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那些还没出过校门的二十岁的小青年，怎么能跟我们这样的好像已经活过一辈子的三十岁的人比呢？除了一开始英文有点儿不适应，着了一阵急之外，我很快就上了道，几乎门门功课都得 A，就是得 B 我也不在乎，不像除了 ABC 之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重要事的乳臭未干的小大学生那样啦。

学生的生活真是乏善可陈，听课，做笔记，做学期论文，做学位论文，做助教，批改学生作业。我的过往经历倒不至于令我厌学，但是作为一个“老学生”，那种初入知识之境的好奇心早就被过多的涉世经历消磨殆尽。六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受到社会学研究的科班训练，学会了日后投身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如何选题，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如何抽取样本，如何实施调查，如何分析数据，如何撰写研究报告，等等。

3 读书与观影

匹兹堡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东亚图书馆，虽然比不上哈佛的东亚图书馆，但藏书量也不错。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李敖，读到

了柏杨，读到了在国内见不到的中文书。读李敖有振聋发聩之感，也有强烈共鸣，以至后来回国后去台湾做学术交流时，听不进台湾学者对他的批评。记得那是在上世纪末的某年，第一次去台湾参加两岸社会科学交流会议，这个系列会议一年在台湾召开，一年在内地召开，坚持了十几年，所以我仅仅为这个系列会议就去了台湾五次。每次会议结束，接待方安排了旅游项目，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台湾游了个遍。在日月潭游湖时，由于会议规格高，我们被告知游湖的船是当年蒋介石用过的船。



李敖

(1935-2018)

有一次，在闲聊中，我问与会的“中研院”社会学所的同行对李敖的看法，他们说：他早就过气了。我听了还挺受伤的，因为李敖曾经是我的偶像。尽管他已经过了气，尽管对他这个人臧否纷纭，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奇男子。他不仅学

问挺棒，做人也相当不落俗套，见过他遮挡要害的裸体照，也喜欢他的打油诗：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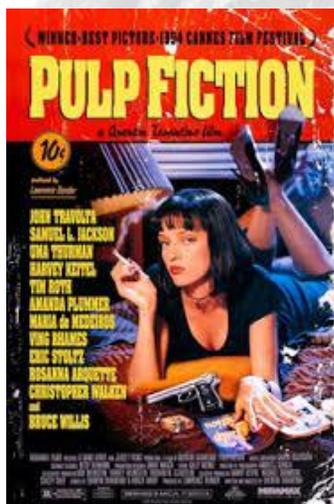
我的爱情浅

尽管有人说他的诗是抄袭徐志摩的，但丝毫不能减少我对他的偏爱。

读书之外，美国生活中最值得留恋的就是看电影。我们成长的岁月中有长达十年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看，翻来覆去地看，到了听上句知下句的程度，何等烦闷，何等饥渴。忽然间掉到了一个电影的汪洋大海之中，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我们从生活费中挤出一点儿钱，订了两个付费电影频道，全天24小时放电影，保证每个月提供60部新电影。在那几年中，无论时间多么紧，我都保持了每天看两部电影的频率。

电影看多了之后就发现，好电影不多，80%的电影都是垃圾，所以日后我就改变了观影习惯，只看口碑好的电影，不是大众说好，而是正经的影评人说好的。至少也要有人写过评论、推荐过的，也就是说，影片即使是失败的，也是值得一评的，否则就不必浪费时间去看。

我们着实看过一批真正的好电影。小波最为推崇的是《美国往事



事》和《低俗小说》，那的确是不同凡响。前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几个黑帮分子源自童年的友情，其中那个他们共同爱恋的清丽的小女孩真是美若天仙、超凡脱俗；后者穷凶极恶的黑色幽默一气呵成，横扫银屏，为人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小波与我在审美方面一向默契，他爱的我也爱，他喜欢的我也喜欢，共同咀嚼、共同回味、共

《低俗小说》

同欣赏这些人类最智慧的灵魂的巅峰之作，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一大享受。

成为“愤怒青年”李敖的靶心

古远清

任卓宣和胡秋原因其“历史问题”——早年曾与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赴台后常常成为论敌“揭老底”的对象。在60年代初发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中，有“愤怒青年”代表之称的李敖，以第一速度投射他的反抗力量，向周围环境表示他的强烈不满与攻击。



胡秋原

(1910-2004)

其中发表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气点名批判了四十位名家学者。其中一个重要靶心是胡秋原。李敖诊断他得了“超越前进病”：“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就是胡秋原。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

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有想到他自己正

是门户之争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他说，胡秋原的论调，跟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跟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跟香港唐君毅的“超越论”“同出一厂”。胡秋原迅即在同年3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创造》，文中称李敖是“梅毒主义”。声援他的还有郑学稼、徐道邻等人。李敖为此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作反批评。其中任卓宣助战最为卖力，发表有《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抱不平》等文章。

双方论战均不冷静，互扣对方红帽子，把文化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如《文星》杂志说胡秋原是“与共党联合战线的闽变分子”，是“狄托第二”，“在伦敦住中共招待所”，“做过《文汇报》主笔”，要求警备司令部出面调查，并在《中央日报》显著位置登出特大广告。胡秋原只好于1962年9月18日宣布起诉，进入法庭，并写《此风不可长》、《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两书，其中也为“闽变”的十九路军辩护。后由二十五位“党国要人”出

面发表声明调解，无结果。由此可见，所谓“中西文化论战”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是再明显不过了。李敖由于触犯了党政要人，尤其是他要求当局开放政权和实行民主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构成了对国民



李敖

(1935-2018)

民党政权的威胁，故无法为国民党所容，1965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封闭了《文星》杂志。1960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胡秋原扩大事态，说《文星》老板的后台萧同兹“背党卖国”，乃与“匪帮”盲进运动相呼应，弄得萧同兹被动，李敖也以“叛乱”罪于1971年3月19日被捕，后被判刑十年。

但李敖把牢底坐穿恢复自由之后，仍不停止对“胡天胡地胡部长”的攻讦，仅1988年就写了《胡秋原冒充胡部长》、《胡秋原“诚实”吗？》、《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胡秋原式的“患难之交”》等犀利的杂文。这些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证明胡秋原的言行确有不

相一致之处。胡秋原长期游离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难怪左派说他右派，而极端的反共人士怀疑他为左派乃至为台独分子“所包围所利用”，还有西化派指他为传统派，而传统派说他根本上是西化派。这便使李敖有空子可钻，去抨击胡秋原以折中为名的保守论及其政治上的“两面派”之处。

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挺身而出

虽然胡秋原属于承认中国文化有不足，希望借助西化来加以补救的主流折中派，但就其选择而言，常常会不自觉偏离这种貌似公允客观的立场，往左或右的方向游走。如果说在与李敖论战中他是偏右的话，那么在1977年夏季掀起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中，胡秋原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观念均明显左倾。

那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彭歌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的文章，对乡土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骢公开点名，作了严厉的政治抨击，再加上余光中在《狼来了》中扬言要对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信徒的陈映真“抓头”，整个台湾文坛由此陷入一片悲愤、焦虑和恐怖之中。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胡秋原在1977年9

月出版的《中华杂志》上，刊出《谈“乡土”与“人性”之类》，对彭歌的文章提出掷地有声的批驳。声援者还有徐复观、郑学稼这些老一辈理论家。这些文章均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的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



余光中

(1928-2017)

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因而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间的矛盾冲突。后来胡秋原还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写了序文《中国人立场之复归》。此文鲜明地主张文学的民族性，认为文学可以写“小人物”和穷人，可以写“繁荣后面”存在的“广大贫困与不幸”。胡秋

原对乡土文学的肯定性的评价，澄清了右翼方面对陈映真他们的诬陷，防止乡土作家的首级被“血滴子”取去，对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这场论战中，陈映真和胡秋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尉天骢同时加盟《中华杂志》编委会。胡秋原也常以国民党开明人士身份声援“党外运动”。如1980年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胡秋原在《中华杂志》发表社论，劝国民党当局宽大处理。到1988年4月“中国统一联盟”成立时，陈映真任首届主席，陈又邀胡秋原任“统联”名誉主席，这正是胡秋原当年说的“从未完全赞成国民党”的具体表现。

（本文选自《几度飘零》）

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许倬云 口述/陈远 采写

随父迁台台大名师荟萃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许倬云与陈远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

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 360 万人，突然增加了 150 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



傅斯年
(1896-1950)

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

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同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同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董作宾

(1895-1963)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

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转学历史归功傅斯年指点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追忆王世杰帮忙做杂务

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是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王世杰
(1891-1981)

后来 1962 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 1970 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 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斥责李敖成了攻击目标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 1980 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前后李敖曾经著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



李敖告赢许倬云

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

“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 记者手记

能把严谨的学术著作写得好看的，非大学者不能为，因为只有大学者既能够钻进去，又能够跳出来，所以写出东西来才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

许倬云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最近出版的《从历史看管理》是极好的一个例子。

用许倬云自己的话说，他的日子“不好过”。

因为身体上先天性的残障，不能去正常读书，十几岁的年纪，一个人到松林去独对一片晴天思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从那时起就学会了“耐住寂寞，往里想，不往外认”。

但许倬云的幸运是，从小时候起家庭就没有因此对他多加照顾或者加以冷落，后来进入中学之后也是如此，后来又因此结到众多“机缘”，得到名师的指点。众多的机缘组合在一起，造就了今天的许倬云。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障碍，有人是身体上的障碍，有人是心理障碍，有人是精神障碍，有人则是道德障碍。与看不见的障碍相比，看得见的障碍无疑显得无足轻重，除了个人生活上的不易。许倬云身体上的障碍在平常人看来无疑是种不幸，但是对于许倬云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身体上的障碍没能束缚住他，反而成就今天的许倬云。今天的许倬云，在学术上，在人生途中，没有任何障碍，这样说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我愿作如是想，算是对许倬云先生的祝福。

2005年11月17日

我眼中的李敖

许倬云

1960年代的气氛真是令人窒息。学校里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有保护自由分子的人。陈雪屏先生是党部秘书长，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张群跟陈雪屏私交很好，张群跟王世杰私交也很好。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鋳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



「姚从吾先生肖像」自撰

姚从吾

(1894-1970)

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



李济
(1896-1979)

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地角星独角龙邹渊姚从吾

胡文辉

姚从吾(1894—1970)，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后以号行；河南襄城人。

元朝作为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之一部，在中国史上为最具异族性的朝代；而元史一门，以关涉中外文献，在中国史研究中又为最具国际性的学问。晚清激于外患，西北史地之学勃兴，元史亦成显学。入民国后，陈垣、王国维各有所成，而学力限于中文史料范围，所谓“土法”是也；陈寅恪挟西法以入禹域，异军突起，然仅昙花一现。迨至三十年代，留西新锐先后归来，斯学遂成“海归派”的天下矣。

海归一代，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皆问学于伯希和，出手不凡，以后大陆推为元史三家，惜俱后劲不足，有若程咬金的三板斧；而姚氏浮海渡台之后，成绩丰硕，且引领风气，海外扶余，亦足以王也。

姚氏原毕业于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复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深造，同时从张相文游，初有志于地理学；1922年通过留德考试，入柏林大学，师从汉学家佛朗克(Otto Franke)、蒙古史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返国后历任北大、西南联大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姚氏的主要著述，已见其自编《东北史论丛》两册、身后所刊《姚从吾先生全集》七册(台版)；其旨趣在北方边疆民族史，早期曾涉猎匈奴史，后专注于辽金元时代，尤以元代为重心。专题论文

甚多，于契丹的政治习俗(君位继承、世选制度、捺钵文化)、军事组织、民族(汉城问题)，于蒙古的战争、选举制度、民族(南人问题)、人物(忽必烈、元好问、丘处机)、思想学术(孔学)、文献(《蒙古秘史》、《心史》)，于辽金元的民族文化(汉化问题)，于辽宋关系、辽金疆域沿革、辽金元长城、辽金元通事、金元全真教，于南宋对蒙古的抵抗及相关人物(余玠)，皆有踏实而专深的考论。专著则有辽金元三朝讲义，内容扼要，史料充实。另有《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一文，是他平生罕有的通论文字，也是他历史文化观的结穴，特别凸显本土儒教文化的维系及同化能力，虽民族意识过于浓厚，可视为由近世国难而生的文化心理回应，然心之所忧，孰能无情哉。

姚氏早年长居德国，极推崇兰克的实证史学，尤重视伯伦汉所总结的兰克治史方法，一生在课堂上鼓吹最力；其《全集》第一集《历史方法论》，即其晚年最后讲稿，以中土史料为例说明外域史法，简明而能切实。他最重视史源学(Quellenkunde)，特别强调“直接史料”，如《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即贯彻这一观念的代表作；又能重视非汉族立场的原始文献，故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及注释》(与札奇斯钦合作)，亦见特识。

按：傅斯年论历史研究法，亦首先区别“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盖傅同样浸淫于德国学风，亦深喜伯伦汉的名著《史学方法论》也。又，陈垣于元史学为姚氏前辈，姚善于综合史料作专题研究，似即继承陈氏作风；而陈亦极推重姚的西学训练，至四十年代多讲授史源学课程，即反受姚氏之影响欤？

姚氏 1948 年出长河南大学，稍后中共兵临开封城下，乃化装为老农逃脱；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主持辽金元史研究室。李敖曾任其助理，后来有谓：“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令人绝倒。

按：据说钱锺书尝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李之于姚，恰如钱之于吴，皆以弟子而嘲笑师尊，才情狂态，堪称无独有偶，在文坛可谓绝代双骄。然以姚氏之笨，而成就如此，固远胜于吴宓之笨，足为世间笨人吐气；而李敖天赋聪明，到底终属文人，在思想学术上又何所成耶？

早期门人有杨志玖、李埏、方龄贵；赴台后，陶晋生继其辽金史方面，萧启庆继其元史方面，杜维运继其史学方法方面。

诗曰：元朝秘史久模糊，蒙语还原亦畏途。一任狂生嘲太笨，读书原是笨功夫。

（本文选自《现代学林点将录》）

《现代学林点将录》提要

辰之

《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初版。胡文辉一九六七年生于广州，一九八九年肄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案：据其友人所写《胡文辉确实是个人物》一文可知，其肄业原因盖系参加了六四学运），有笔名胡一刀，现供职于羊城晚报，业余醉心学术，编著有《陈寅恪诗笺释》《陈寅恪语录》《洛城论学集》《洛城论学二集》《人物百一录》《拟管锥编》等，而以《现代学林点将录》尤为知名。

以水浒一百零八将推比今人的点将录形式，首见于晚明天启朝之《东林点将录》，后又有多
种《诗坛点将录》《菊坛点将录》
《印坛点将录》现世，胡氏此书亦如其例，收录近世中国学人一百零九位（案：多一旧头领，系以章太炎为托塔天王），并附海外汉学家十九位。其中“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即李敖之师姚从吾，评价中援引李敖谓姚从吾“狗熊进玉米园”之喻，并称：“然以姚氏之笨，而成就如此，固远胜于吴宓之笨，足为世间笨人吐气；而李敖天赋聪明，到底终属文人，在思想学术上又何所成耶？”



胡文辉

颇为姚从吾打抱不平（案：其言语中亦带有对文人之不屑，似文人低于学人一格，盖亦除他外一众广东报人皆欲强跻学林之原由）。

关于李敖在思想、学术上是否有贡献，有多少贡献，恐怕莫衷一是、难有定论（案：专业学人如汪荣祖、姜义华、黄克武等即与胡氏持不同观点）。即有定论，也无关乎李敖宏旨。仅就学术而言，李敖本非有志经营，其平生贡献之主体亦非学术，故学术之高下对其自无多少影响。倘使李敖身居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之职，若未有姚先生之成绩，则胡氏之诘犹合乎情理，然李敖自承是“学术圈外的野狐”，则胡氏亦不必以此诘之。

李胡二人可谓互成镜像。李教科班出身，胡文辉中途肄业；李敖早年立足于学术，胡文辉早年有志于社会；李敖在学界挣扎失败而冲向社会，胡文辉在社会冲决失败而隐遁学术。二人如今所立志之所皆是对方曾经抛弃了的，故胡文辉不与李敖，而李敖亦必不与胡文辉。但在学术界的边缘，找出十个胡文辉式的“学人”并非难事，在社会上再找出一个李敖式的“文人”来却谈何容易。

胡文辉虽非专业出身，但其著作水平实要比一些顶着学者头衔混饭吃的人高上许多。而在本业与学术之外，胡氏亦时常关注社会时事，常作诗暗讽。比起其大学时代，已是深谙亏不能吃两遍的道理，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者也。此盖学术之药效，一入学术之境，便可忘怀天地，不问世事。可偏偏胡氏于象牙塔外犹有所思，故常以诗为鸣，只可惜每每做诗，便学人气渐少，文人气渐多。

（本文选自《李敖相关书目编年提要》）

李敖投资拍片 第一部邀林青霞主演

(台北消息)李敖在 23 日宣布进军影坛,将与在美经营餐馆之葛大卫合作,投资电影制作及唱片业。

李敖透过其合伙人已邀得林青霞答应拍片,林青霞并已在美接下订金,签有同意书。

李敖计划摄制十部电影,林青霞将演出第一部,预期于明年 2 月前完成;9 月后,李敖将会赴美一行,到时,当会与林青霞会晤,商讨拍片事。

一向从事写作的李敖,何以忽然插足娱乐事业?李敖以他一贯的自负口吻说:「我不承认电影『中不如西』的说法,我相信中国电影可以朝世界影坛进军。」同时,他亦不同意台湾编、导、演「今不如昔」。

(原载于 1980 年 8 月 26 日《星洲日报》)

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

曹可凡

2005年盛夏，我率《可凡倾听》摄制组专门飞赴成都，和流沙河先生做访问。

流沙河先生的家与大悲寺相毗邻。当年，杜甫因“安史之乱”逃难至成都，便先在大悲寺落脚歇息。虽说老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点古雅气息。

说起流沙河，人们自然会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篇《草木篇》，这首诗其实只是以白杨、藤、仙人掌、梅和毒菌为赋，表达诗人爱憎的心情，现在看来平平常常，但那时却掀起轩然大波，被认定为“大毒草”。最高领袖甚至还在

《草木篇》空白处写下颇有分量的批语：“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于是流沙河被打入冷宫，只得以做木匠活糊口度日。后来，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提及流沙河，讲话大意是“下海总要呛几口水。了不起就沉下去嘛！原来有两个人沉下去，但刘绍棠不是已经起来了吗？流沙河还沉在水里。”总之，那时的流沙河可算是“恶名远扬”。对此，写过《死水微澜》的作家李劫人大为不解，他认



曹可凡

为像《草木篇》那样拟人化的诗作古今中外数不胜数，流沙河何以凭这样的诗出名？最后，他哀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如今的流沙河远离尘嚣，闭门谢客，蜗居在一幢简陋的公房内，吟诗作文，怡然自得。

余光中的《乡愁》家喻户晓，最早将余光中诗歌引进内地的，就是流沙河，我们的谈话便由此衍伸开来。说起余光中，流沙河的语调不紧不慢，“1981年初秋，差旅东行。列车长途，不可闲度，终于在酷暑与喧嚣里读了余光中等数位台湾诗人的作品，真是满心欢喜。特别是余光中的《当我死时》《飞将军》《海祭》等诗最使我震动。读余光中的诗，就会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的话‘吾乃今于是乎见龙’”。之后，流沙河又在《湿湿》诗刊撰长文介绍余诗。流沙河还到处开设讲座，专题分析余光中《乡愁》《所罗门以外》《等你，在雨中》《唐马》等诗作的艺术成就。

“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辞。讲余光中我上了瘾，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己，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原来，流沙河本名余勋坦，大哥叫余光远，因此，有读者误以为余光中是他二哥，而且根据推算家中还该有个三哥余光近。这样，远、中、近就排齐了。而那时，流沙河和余光中根本还不认识，连面都



流沙河

(1931-2019)

未见过。

1982年，余光中给流沙河写信，信中说：“东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声，就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光中先生曾在四川度过抗战岁月，自称为‘川娃儿’）。”四年后，余光中在《蟋蟀吟》表达了相同的故国之思：“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受到心灵触动，流沙河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为回应，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然而，朋友间的酬唱之作，竟被人嘲谑为“蟋蟀抗战”，说到此处，连流沙河先生自己也忍不住开怀大笑。

对于李敖在电视上公开批评余光中，流沙河颇不以为然：“李敖骂余光中那档节目我看了，感到非常诧异。他拿出余的一首诗，才念了三行，就说余诗文理不通，句法不通，认为这是骗子诗。这完全是两码事。即便句子不通，顶多也是语法问题，与品德无关。倒是李敖自己对《诗经》的解释是大言欺人。”流沙河在这里指的是李敖对《诗经》中“女曰观乎，士曰既且”的解读。李敖认为这是写男女苟合，“观”就是“欢”，是做爱的意思，“女曰观乎”翻译成白话便是女的央求男的做爱；而“士曰既且”中的“且”，则指男性生殖器，作为动词用，指男性性行为，“既且”就是已经做过了。“这个说法毫无道理，因为《诗经》中的‘观’，观察的‘观’，有十二种解释，但没有证据证明‘观’可以和‘欢’通用，而且也没有理由认定‘欢’就是做爱。因此，李敖的这种说法只能蒙骗那些没有读过《诗经》的人。但是我读过，我读《诗经》时，李敖还是小学生，连《百家姓》都还没读。他懂什么？”说话时，流沙河眉宇间流露不屑的神情。

至于余光中和李敖，他们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交往，虽谈不上热络，倒也相安无事，而且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有一段《文星》期。《文星》是出版人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创办的文学刊物，



余光中
(1928-2017)

同时还有同名书店，拥有梁实秋、余光中、林海音、李敖等当时台湾名噪一时的作家，是当时台湾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余光中曾负责《文星·诗页》的编辑工作，并在“文星”出版了《左手的缪斯》《掌上雨》和《逍遥游》三本散文集以及《莲的联想》和《王陵少年》两本诗集。而李敖登上《文星》舞台后，则以《老年人和棒子》《播种者胡适》和《给读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三篇文章初定乾坤，引世人关注，数年后，还一度出任《文星》主编。李敖一系列思想激进的文章，

惹恼了当局。1965年年底《文星》被彻底封杀，得知消息，余光中愤笔写下《黑天使》和《有一只死鸟》两首诗，以表达悲痛和震惊。特别是《黑天使》，有着难言的哀伤和悲壮：“我就是黑天使，我永远/独羽逆航，在雨上，电上/向成人说童话/是白天使们/的职业，我是头颅悬赏/的刺客，来自黑帷以外。”

但，文人终究以卖文为生，因为所有著作遭禁，李敖想到改行去卖牛肉面以维持生计，他给余光中写信，其中有一段说：

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诚是骇份之举，但对于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析、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岂足怪哉……

接着又说：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做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牛肉面锅之中，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牛肉面好吃与否或有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

接获李敖信函，余光中倚马可待，一挥而就，一篇言辞恳切的赞助信这样写成，全文如下：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面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惟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面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隐市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垆，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同样也是出于生存考虑，梁实秋、余光中和林海音等人后来与

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商量，既然出版社已关闭，是否能收回他们在“文星”的书，以便这些作品可由其他出版社继续出版。素来爱打抱不平的李敖认为这是忘恩负义之举，对余光中等人多有指责。此举发生近二十年后，李敖受萧孟能太太朱婉坚之托，以违反著作权为由，一纸诉状将余光中告至法庭。从此，两人便很少交往。

在采访余光中先生时，我曾问他为何面对李敖的攻击从不反诘，余先生不无揶揄地说道：“他一直骂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一席话，说得大家忍俊不禁，“当然，最主要的向我老师梁实秋先生学习，中年以后不接招。”

说到梁实秋，我倒想起余先生早年写过一首名叫《闻梁实秋被骂》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似乎，我看见，在那边的弄堂里
小鼻涕们在呼啸，舞弄玩具刀
幻想那是真正的战役
而自己是武士，是将军
遂有一场很逼真的巷战
以真正的名将之敌，名将在
在那边的方场上，孤立而高
赫赫，显显，多顺手的目标
于是，铜像的面目模糊
四方飞来呼啸和泥土
和小鼻涕们胜利的哄笑



梁实秋
(1903-1987)

但时间

时间的声音是母亲，一一
叫回家去，把小鼻涕。母亲说
不早了，该回家吃晚饭了
留下方场寂静如永恒，泥土落尽
留下铜将和铁马，在夜空下
戴这样高而阔的灿烂如一顶皇冠

这首诗可以说是余光中面对世事纷扰的真实内心写照。

从鲁迅和梁实秋，刘海粟和徐悲鸿，到余光中和李敖，陈逸飞和陈丹青，杨振宁和李振道，世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此起彼伏，外人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甚至，有时根本也说不出究竟孰对孰错。透过那些表面的嚷嚷声，倒可以瞥见当事人不同的境界和心态。

（本文选自《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提要

辰之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曹可凡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初版。曹可凡祖籍无锡，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作为内地知名主持人，其主持的访谈节目《可凡倾听》一直颇受欢迎。

曹可凡此书，系将去三十年采访生涯中与名家接触之记录感悟结为一书，其中《囚徒的呐喊》一篇专写李敖，而《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一篇中则又言及李敖、余光中、流沙河三人。综合两篇内容来看，曹可凡对李敖并不赞同，甚至颇为反对。如《囚徒的呐喊》开篇称“钱穆、胡适早年对他投以青眼。胡适甚至在其最困厄时寄去一千元支票一张，让他从当铺赎回三条裤子。但李敖后来对钱、胡的批判丝毫不留情面”是“六亲不认，忘恩负义”，即为欲扬先抑之用，也属断章取义，将李敖对钱穆的肯定、对胡适的回报一概抹杀。至《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中则更甚，其文章名目及出自余光中诗中，以此比喻余光中对李敖之态度。

夫李敖与余光中早在文星时便已结识，李敖欲下海卖牛肉面时二人还颇多唱和，但后来还是由于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之行径及李敖为文星书店老板娘朱婉坚追索版权等事而决裂了（案：余光中后还曾因那些书的版权和水牛出版社打了官司）。大陆对于余光中的印

象，大多限于一首《乡愁》，自曹可凡采访过余光中后，又多加上了一句“他一直骂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案：此语即曹可凡问余光中为何面对李敖的攻讦从不反击时，余光中的答复）而已。对于李敖读者而言，大概还听过李敖谈及余光中在香港演讲时称文星书店是因财务问题倒闭的一事。而实际上，就在李敖因为政治迫害而缺位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的同时，他这位旧日朋友却主动充当了“告密者”。

早在一九七三年，余光中就以“思想危险”、“左倾”为名陷害了文学观点不一致的唐文标，还在《诗人何罪》中称被陷害者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后又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发表大作《狼来了》，来配合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彭歌污蔑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们（案：如陈映真、王拓、黄春明、尉天聪、杨青矗等）是“工农兵文艺”。要知道，这可是在白色恐怖时代，可这位大诗人却仅仅因文学观念的冲突，便要行此卑劣手段指斥异己为“红色”，来换取军政两界的宠幸。尤其是在对陈映真的迫害上，余光中竟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用马克思的文字找出并仔细批注，寄给了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案：也是萧孟能案中介入的政治力量“刘少康办公室”的负责人），此可谓余光中诸多卑劣行径中最为卑劣的一个，因为这在当时足以要了陈映真的性命（案：见赵稀方《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余光中真可谓生不逢时、生不逢处，如果文革时期他在大陆，要打倒的就该是“五人帮”了。

至于流沙河，则纯属因欣赏余光中而厌恶李敖（案：据曹氏书中所说，流沙河是大陆最早引进余光中诗作的人，还特开讲座赏析

余诗。又二人皆为诗人，且都姓余，亦属惺惺相惜、同姓相吸了）。其为余光中之诗作辩护，进而攻讦李敖之学问，竟称“但没有证据证明‘观’可以和‘欢’通用”，其学识竟浅陋如此？查《古文字通假字典》并《古文通假会典》诸书，可知观欢通假之例早见于《左传》《晏子》，后亦见于《文选》等书，岂是所谓“没有证据证明”（案：流沙河将这一批评写成文章《李敖譬说诗经》，并发在二〇〇五年的《文史杂志》上）？

大陆不少人对于余光中和李敖看得都很朦胧，提起来余光中，就是诗人、乡愁、不接招、好好先生；提起来李敖，则是好讼、胡说、爱骂人、一介狂生。很显然，余光中的形象会更符合曹可凡、流沙河这些道德君子们的胃口。然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了，余光中的好好先生表象下是一颗何其阴狠残鸷的心。可大众往往就是被表象所吸引并为之沉迷。对于他们而言，对批评沉默并非理亏，而是人生智慧，是人情练达。所谓境界、心性、积淀等名头成了他们的追求，至于背后的真相如何如何，对很多人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本文选自《李敖相关书目编年提要》）

祝你·不要·撞車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 第六輯

-
- 編著者 辰之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文星書店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敖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董事長 蘇榮泉
監管組 辰之 督印組 辰之 校訂組 海心
編輯組 辰之 資訊組 辰之 美術組 辰之
訂戶組 海心 發行組 海心
代理發行 小書書報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 劉會雲 Martha Liu
總負責人
P.O. Box 14767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 版次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 定價
-